



内部资料

国际财经评论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 Business

2022 年·春

北京外国语大学二十国集团研究中心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产业金融管理专业委员会

2022 年 3 月《国际财经评论》(内刊)



公众微信号

地 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9 号北京外国语大学西院国内大厦 2 号楼

510 办公室

邮 编：100089

联 系 人：金老师

联系方式：010-8881 6753

传真：010-8881 0062

收稿邮箱：g20@bfsu.edu.cn

jinyujie@bfsu.edu.cn

网站：g20.bfsu.edu.cn

目录

第一章 韩国大选后的中韩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	2
第二章 国际能源现状及展望.....	5
第三章 WTO 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条款研究：基于地位、待遇和责任的三元视角	15
第四章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出口不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制造业行业为例	22
第五章 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29
第六章 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全球价值链出口活动的调节效应..	37
第七章 疫后中文国际化发展的经验来源与新路径探析.....	38

第一章 韩国大选后的中韩经贸合作与文化交流

禹辰勋¹ 武悦²

3月10日，在野的国民力量党候选人尹锡悦，以0.73%的微弱优势，在韩国第20届总统选举中获胜，这是历届韩国总统选举中竞争最为激烈的一次。尹锡悦1960年12月出生于首尔市，毕业于首尔大学法学院，2017年任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检察长，2019年7月任检察总长，在检察总长任内，由于其大力打击积弊，积累了非常高的政治声望。

2021年6月，尹锡悦宣布竞选总统。尹锡悦属于政治素人，其主要的政治理念，包括了法治精神、市场理念、效率优先，比起平等分配更强调经济发展，因此受到不少青年选民的喜爱。不过，也因缺乏从政经验，到目前为止，所表现出的政治敏感性及沟通能力尚显不足。

一、新政府面临的国内外挑战

尹锡悦候任总统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挑战不容小觑。首先，从选举结果可以看出，两位候选人的支持率非常接近。其所代表的执政集团，在平衡右翼和左翼、效率与公平、资本与劳动、两性差异，世代交替等议题上，都面临着极大地困境。例如，包括房价暴涨，家庭债务，青年失业等，都亟需新政府优先解决。加之，俄乌冲突导致的国际油价飙升，对于对外依存度较高的韩国经济将带来不少困难。能源价格上升会很快传导到物价上升，居民和企业的成本都将面临上调。这些问题由于牵涉复杂的国际关系，解决起来可谓困难重重。

其次，尹锡悦候任总统在竞选阶段曾经数次主张加强韩美同盟，改善韩美日关系。在中美竞争日益走向全方位的大环境下，如何确定韩国的外交及经济政策的重心，如何处理好朝核问题以及韩中、韩日关系将成为外交政策的关键。为此，传统的韩国外交政策中的周边四强（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势必面临新一轮的博弈和竞争。在中韩关系问题上，两国共同经历过建交30周年的风风雨雨，也已经形成互惠合作和政治互信的关系。在中韩互为主要战略伙伴和经济合作伙伴的观点已成为双方主流意愿的背景下，新政府想要大幅度倒向美国一方，也势必会引起工商界和民间理性声音的反弹。具体走向值得关注。

二、中韩经贸合作的压舱石作用

尹锡悦候任总统在竞选期间与中国驻韩大使邢海明会面时表示，以中韩建交30周年为契机，两国应加强相互理解，如果当选将会让中韩关系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当选后于11日双方再次会面时尹锡悦称，中国是韩国最大贸易伙伴，韩国则是中国第三大贸易国，互惠合作对两国经济发展大有裨益。在各种双边关系中，中韩两国的经济合作将成为韩国新政府的重点政策。

过去30年，中韩两国在所有的领域都开展了高水平的合作与交流。其中，经贸投资领域起到的

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

²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

作用尤其显著，这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质性的利益。两国的相互投资达到 1000 亿美元，年贸易额突破 3000 亿美元。同一时期，韩国对中国出口增长 54 倍，中国对韩国出口增长 29 倍，两国之间的产业链、供应链得到高质量发展且实现了高度的融合。去年，尽管因为疫情造成了市场的萎缩以及供应链的严重不稳定，但是两国贸易额依然同比增长 28%，体现了两国经贸合作的韧性和潜力。两国在投资合作领域正在不断扩大合作范围。中国国际跨国公司促进会(CICPMC)发布的“2021 年中韩跨国公司投资合作动态报告”现实，韩国三星、现代、SK、LG 等跨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半导体、氢能汽车、电池、汽车钢板、信息通信、工程机械、物流、保险、药品、食品等领域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同时不断加强同中国企业的战略合作。

2015 年，两国签署了划时代的中韩自贸协定(FTA)。2022 年 1 月 1 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已经正式生效。在这两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共同发挥的引领作用下，两国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规模必将进一步扩大。

RCEP 作为世界最大的多边合作体系，覆盖了世界人口的 30%以及占世界贸易额的 29%，将会大幅度降低参与国家的关税，并扩大区域内经贸合作。成员国和东盟(ASEAN)之间的贸易投资将继续增加，日韩之间以及中日韩三国在 RCEP 体系内的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增强，同时也会加快“日韩 FTA”和“中日韩 FTA”谈判进程。此外，RCEP 在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保护主义扩散所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不稳定问题的解除方面，也被寄予了巨大的期望。作为东亚经济的主要经济体，中日韩三国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与升级将会对 RCEP 的稳定发展和高质量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KIEP)分析认为:在过去 20 年里，中日韩三国的材料、部件和装备产业同全球价值链(GVC)的相关性愈发紧密，目前，已经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 GVC。尽管中日韩之间外交问题不断，中美摩擦严峻，新冠疫情仍未消退，在将来一段时间内难以形成可以替代的新形式的 GVC。三国的经济及技术合作，对彼此起着愈发重要的作用，保持目前的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对于 RCEP 成员国之间合作与发展，以及创建稳定的东亚增值价值链有着深远的意义。作为一个指标性的观察角度，韩国目前对于美国提出的美日韩台的芯片同盟，并没有表现出热烈拥抱的态度。

新冠疫情肆虐全球的 2021 年，中国的出口和进口仍同比增长 29.9%和 30.1%，再次证明了中国经济和产业链、供应链的坚固性，这部分地得益于中韩两国政府和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供应链的方面进行的合作。两国的产业链、供应链得益于地理邻接、产业互补以及中国经济增长，在紧密的合作中得到了自主性发展。两国都注意到了这一链条可能的脆弱性，并在通过双方的努力，提升其稳定性。在这一背景下，在 1 月 26 日举行的中韩自贸协定第四次联委员会会议上，双方重点讨论了应对全球供应链不稳定的方案，并就保障能源、矿产资源供应、物流网络、通关合作等事宜进行了磋商。

与此同时，RCEP 也可以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搭建稳定持续的产业链、供应链起到很好的平台作用，中韩两国的政府和企业应给予足够的关注。两国可以在 RCEP 以及多边经济合作的框架内，在协商基础上开展两国共同市场的开拓，包括在东南亚、中东、远东、南亚、拉美等第三方市场和新

兴市场，两国的发展将会对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多边自由贸易体系的维护发展做出新的贡献。

三、中韩文化交流的稳定器作用

尹锡悦候任总统在确认当选新一届总统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表示，今后将进一步发展相互尊重的中韩关系。两国需要通过更紧密的政府间沟通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加强民间层面的外交活动，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年轻一代之间的人文交流。儒家有云，三十而立。人到三十，取得了一些成果，对自己的言行更加自信。迎接建交 30 周年之际，中韩两国也同样需要基于过去的成就以及对未来的信心，准备新的三十年。

新时代，新启航，新合作，寻找机会解决难题，构建新的两国关系格外重要。自建交以来两国之间的人文交流得到了蓬勃的发展。直到疫情之前，两国的人员往来每年达到 1000 万人次。两国人民也经历了相互学习、相互理解、互相认识的过程。尽管政治制度不同，但两国的历史和哲学紧密相连，各自的文化通过韩流、汉风的方式融入彼此的文化当中。两国同属儒家文化圈，无疑加深了知识阶层之间的对话深度。随着两国间留学生数量不断增长，未来一代之间的沟通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疫情期间，中韩两国政府及民间的互帮互助、携手抗疫充分体现了双方对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彼此间的友好情谊。两国在防疫合作领域建立共同防疫机制，通过企业家快速通道保证了人员往来，帮助两国企业和供应链的正常运行。与千年的文化交流相比，30 年的光阴十分短暂。突如其来的疫情使两国人民看到了彼此的仁义之心和友爱之心。2021-2022 年是“中韩文化交流年”。因为疫情很多活动没能启动，相信一旦疫情过去，恢复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正常交流，两国的人文文化交流将会迎来新的发展，两国的交流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都会迎来质的提升。

作为搬不走的邻居，无论是中韩两国还是中日韩三国及东盟，一旦在该区域内因政治问题引发矛盾，受伤的是两国人民。两国及周边国家，应当审慎思考，积极排除域外国家的恶意干扰，通过深化相互之间的文化交流，拉进彼此的感情关系，防止成为域外国家大国战略的棋子。

因此，中韩两国需要开展持续性的战略沟通和经贸合作，充分发挥 RCEP 平台作用，在引领东亚地区合作的同时，做出两国民心相通方面的努力，避免经济合作受到不必要的干扰。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着保护主义、种族主义、文化大变革的激荡时期，中韩两国理应更加智慧地维护两国以及东亚地区可持续发展环境和文化价值的构建，保持着沟通与合作的定力。通过这种努力，加强经济及人文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实惠。

离开经济基础的政治逻辑是虚无缥缈的，没有一种政治价值可以高于国家繁荣及人民幸福。两国的未来 30 年将会是衡量两国以及东亚地区持续发展和持久和平的试金石。我们相信新一届的韩国政府将与中国政府一道，共同开创中韩睦邻友好的新篇章。

第二章 国际能源现状及展望

武悦 张钰函 王诗 沈琦

《能源经济学》一书中指出：1980-2018 年间，世界生产总值与能源消耗量的相关系数为 0.997，表明能源和经济发展间存在密切的正相关关系。以中美两国为例，美国能源产业的发展支撑了本国 GDP 的增长，石油和天然气工业为美国提供了 1030 万个工作岗位，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 8%³。《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 2020》白皮书指出，我国以能源消费年均 2.8% 的增长支撑了国民经济年均 7% 的增长⁴。可见，能源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来源，许多生产和消费活动都涉及能源作为基本投入，在国民经济中有重要的战略地位。能源的使用推动了经济生产力和工业增长，是现代经济运行的核心。

一、国际能源现状

从能源分类来看，化石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资源，是全球消耗的最主要能源。随着人类的不断开采，化石能源的枯竭是不可避免的，这就需要我们找寻化石能源的替代品。新能源由于可再生、环境污染小的特点越来越被各国重视，如日本提出建设氢能社会，韩国发布绿色新政支持海上风电建设，巴西推动生物质能发展等。

当今，国际能源现状可以两点总结，一是依旧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二是新能源的迅猛发展。石油仍是全球能源格局的重要主体，但能源品种趋于多元化，国际新能源的迅速变化会影响到全球能源格局的变化。根据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能源行业 2050 净零排放路线图》预测：到 2035 年，可再生能源占比将首次超过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到 2050 年，可再生能源将取代化石能源占据主导地位。

（一）对化石能源的依赖

根据 BP《2021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化石能源仍是 2020 年能源消费领域的主导，占比高达 83.1%。其中，尽管石油消费量同比大幅下降，但石油消费量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仍居高位——31.2%，石油仍是最重要的能源。此外，煤炭的占比为 27.2%，天然气为 24.7%。国际能源署 IEA、BP 等机构预测 2035 年左右天然气将超过煤炭成为第二大能源。

经济增长越快的国家对于能源的需求量越大，能源消耗量也就越大，尤其是对化石能源的消费也就越多。从图 2-1 中可以看出，化石能源消耗占能源消耗总量的比例整体呈下降趋势，但世界平均占比仍保持在 80% 左右的高位。美国、中国、英国、德国、俄罗斯、日本、韩国的化石能源消耗占比都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其中俄罗斯 2004-2014 这十年间基本保持在 90% 的水平，化石能源消耗占比最大。法国、加拿大和印度化石能耗占比低于图中所列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

³American Petroleum Institute. Oil and Natural Gas: Supporting the Economy, Creating Jobs, Driving America Forward. <https://www.api.org/news-policy-and-issues/taxes/oil-and-natural-gas-contribution-to-us-economy-fact-sheet>.

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白皮书[R/OL]. <http://www.scio.gov.cn/ztk/dtzt/42313/44537/index.htm>.

印度化石能耗占比相当，在 70%左右的水平上下波动。而法国的化石能耗占比相对来说更低，基本保持在 50%左右的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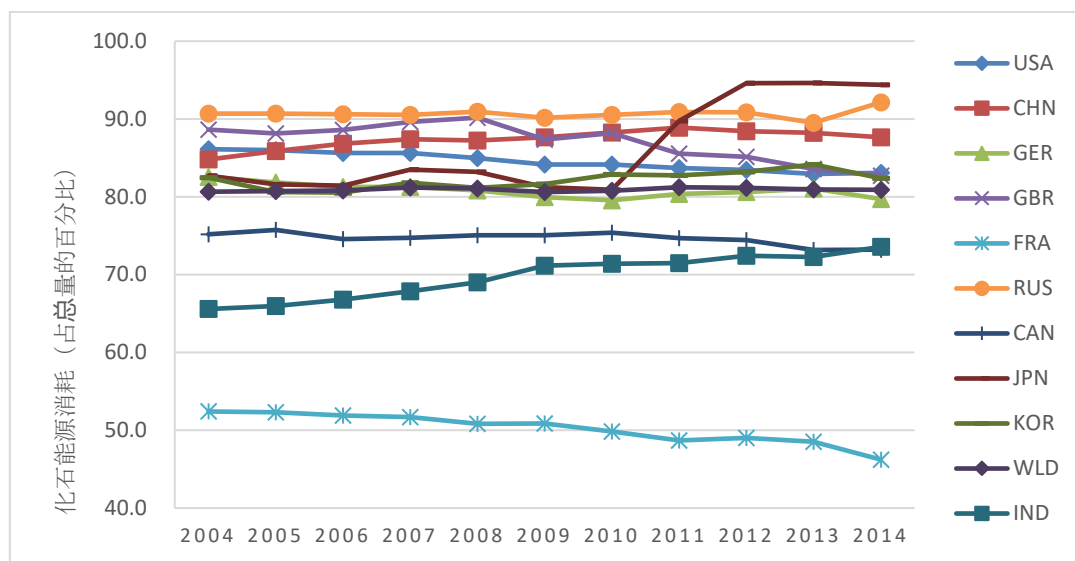


图 2-1: 世界主要国家化石能源消耗占总量的百分比

(来源: 世界银行)

受疫情冲击后全球经济复苏、中国和印度需求反弹、极端天气和发电供给恢复稳定等多因素的影响，2021 年天然气和煤炭的价格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国际原油价格在 2021 年 11 月份暴跌后，于 12 月又快速反弹。近期，俄乌战争的爆发在短期内迅速推高油价，全球石油价格飙升至每桶超过 110 美元，达到 2008 年 9 月以来的最高位。对于依赖俄罗斯原油和天然气的欧亚国家来说，俄乌战争的爆发给能源供给带来较大威胁。美伊核协议谈判的重启和美联储加息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油价，但是作用有限。所以近期美国等国家释放原油储备，从而降低国际原油价格。整体来看，如图 2-2 所示，国际原油、天然气、煤炭价格保持波动上升趋势，但受国际政治及经济形势影响，原油价格波动幅度较大，高于煤炭和天然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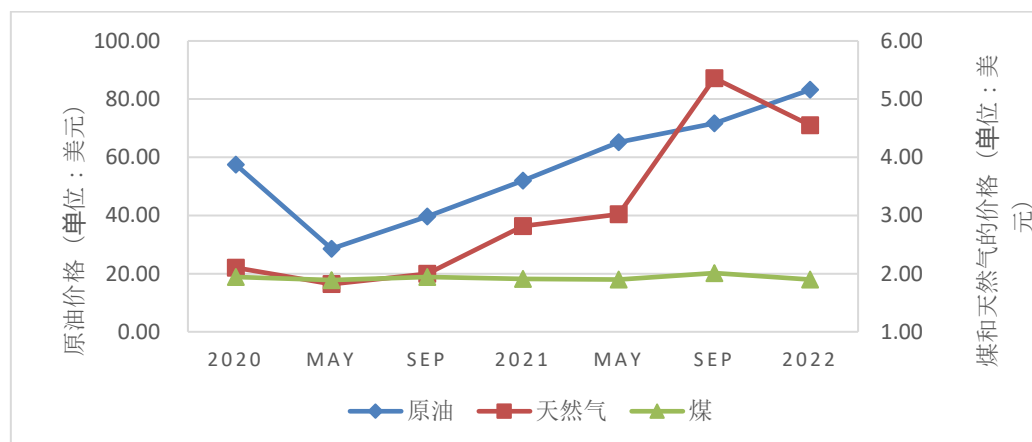


图 2-2: 三大化石能源价格波动

(来源: IEA)

石油作为重要的化工原料，油价的波动通过原料成本传导到石油全产业链。石油产业链一般分为上游、中游和下游三个部分，整个产业链与国民经济生活息息相关。上游企业主要负责原油的勘探和开采，中游企业主要负责石油的储运，下游企业主要负责石油的加工和销售，具体包括炼油、化工和销售三个环节。近期油价上升推高上游企业价格，直接带动相关企业收益的增加。但油价上升会给中下游企业带来压力，不同于中游企业可以将部分压力转移到下游企业，下游企业只能被动接受价格传导。并且，下游企业与社会生活的关联更直接，油价上涨会在一定程度上带动 CPI 和 PPI 的上升，但影响相对较小。

油价上涨不仅直接影响石油产业链，还会对整个经济市场带来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油价上涨会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压力，原油涨价带动煤炭等替代能源价格上涨，引起更大范围的物价上涨。如果因油价的上涨导致其他方面商品的价格上涨，那么结构性的通胀演化为全面通胀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油价上涨对市场也有影响。黄金作为避险资产，当地缘政治冲突引起油价震荡时，投资者会更倾向于买入黄金，需求的增加带动国际黄金价格的上涨。另外，油价的上涨对我国 A 股市场也有一定的影响。国际油价受到冲击后，A 股市场的表现特点是在油价上涨的前期往往跟随油价上升而上升，当油价攀升进入中后期，股市往往先于油价见顶，利好通胀受益和财政扩张受益类行业。

综合以上分析，不论是能源消费高占比还是关联市场各方面，都体现了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于化石能源较高的依赖。

（二）新能源的迅猛发展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了极大冲击，导致全球经济复苏放缓，给全球能源产业的发展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同时也推动了全球能源格局的演进和重塑，推动世界能源结构向天然气和新能源等低碳能源为主的新格局演进。

美国、欧盟等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最先开始新能源的大规模开发。美国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发起新能源战略，主要目标是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耗中的比例。根据《世界能源发展报告 2021》：2020 年美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容量同比增长 80%。欧盟于 2012 年投入约 12 亿欧元启动可再生能源项目，到 2030 年，欧盟总发电装机容量中可再生能源将占到 36.1%，将在可再生能源领域投资 180 亿欧元。近年来，以中国、印度、巴西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陆续将新能源作为能源产业革新的主要方向⁵。《世界能源发展报告 2021》指出：2020 年，中国可再生能源产能占全球装机容量的 45%，可再生能源投资达到 836 亿美元，约占全球投资总额的 28%，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处于领先地位。

新能源迅猛发展是历史的偶然也是历史的必然，主要原因一是化石能源价格不断上涨、供不应求，且影响因素复杂、涉及利益群体众多、不确定性较强。一方面，由于化石能源本身不可再生的

⁵ 21 世纪全球可再生能源政策网络.2021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现状报告[R/OL].
https://www.ren21.net/wp-content/uploads/2019/05/GSR2021_Full_Report.pdf.

特性和 OPEC 减产、俄乌战争，导致化石能源供给减少。另一方面，化石能源需求在增加。新冠疫情后世界对于化石能源的需求渐渐恢复以及全球极端天气频发对可再生能源供给造成威胁，导致世界对燃气发电依赖的增加，进一步推升化石能源价格。

二是化石能源对环境的污染日渐突出，化石能源碳排放是全球碳排放的主力，2020 年 3 大主要能源的碳排放量分别是煤炭 13.98 十亿吨、石油 11.07 十亿吨和天然气 7.4 十亿吨。其中，煤炭的碳排放量最多，石油和天然气的碳排放量分别是煤炭的 79%和 53%，与新能源的低碳排放量差别巨大。大量的碳排放量加速了全球变暖的趋势，增加严重的干旱和洪水等极端自然灾害发生的可能性，给全球生态环境带来极大压力。

三是新能源发电成本下降，尤其是太阳能和风能的电力成本持续下降，更利于提升新能源相对于化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截至 2020 年底，我国风电、光伏发电装机达到约 5.3 亿千瓦，是十年前的 18 倍。随着产业技术进步、效率提升，近年来各国新建光伏发电、风电项目成本不断下降，新能源发电总体上即将进入平价上网时代。从图 2-3 中可以看出，与 2010 年相比，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平准化电力成本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较为明显的是光伏和海上风电。其中，光伏从 2010 年的每度电 0.35 美元左右的成本下降至 2020 年的每度电低于 0.1 美元。海上风电从 2010 年的每度电大约 0.17 美元下降至 2020 年的每度电低于 0.1 美元。整体来看，风电和光伏发电成本在下降，为市场大规模应用提供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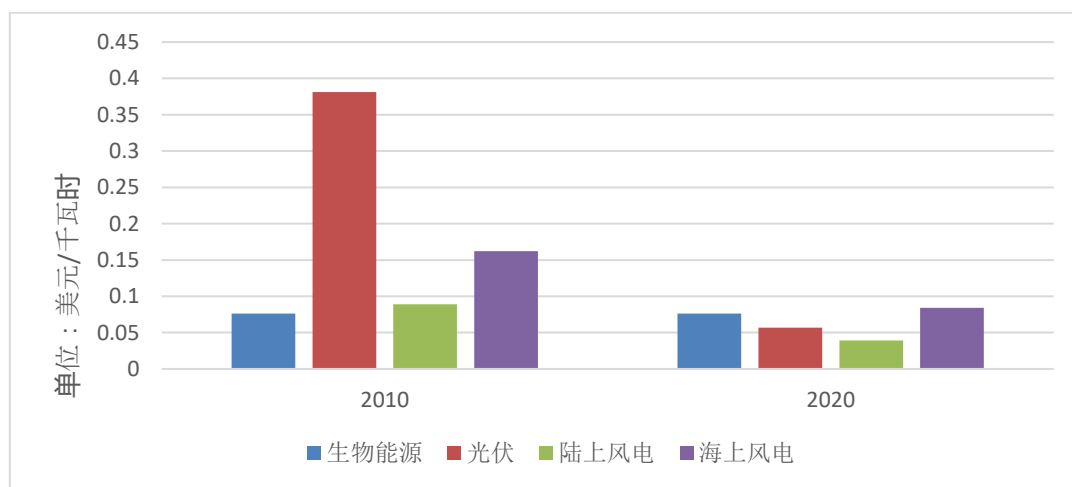


图 2-3：2010 与 2020 年全球可再生能源平准化电力成本对比

(来源：BP 世界能源统计年鉴 2021)

基于此，许多国家都把新能源投资作为经济绿色复苏的重要手段。越南倡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实现循环经济是越南履行有关保护环境，协助企业减轻危机，助力投资、技术革新、降低生产成本、扩大供应链、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提升全社会和大自然的健康水平等国际责任的方式。由于盛产甘蔗，巴西一直积极推动甘蔗等生物质能发电，在生物能源利用上居世界前列。德国近日决定加速新能源发展，推动风能和太阳能基础设施的扩张，拟将 100%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目标大幅提前至 2035 年。日本是全球第一个提出建设“氢能社会”的国家，并制定了国家氢能发展战略，计

划到 2030 年实现氢能发电商业化。我国以碳达峰和碳中和为能源转型目标，到 2030 年，基本建立完整的能源绿色低碳发展基本制度和政策体系。2020 年，韩国政府发布“绿色新政”以加快本国清洁能源的发展，尤其是海上风电的建设，计划到 2030 年成为全球海上风电五强之一。与德、日、韩等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新能源政策有待于进一步明确和完善。

国家层面对于发展清洁能源的重视推动了清洁能源行业投资与就业的增加。根据彭博新能源财经的统计数据，2021 年全球在部署低碳能源技术上花费了 7550 亿美元（约 4.7 万亿人民币），同比增长 27%，其中近一半投资发生在亚洲，中国占全球投资总量的 35%。

总体来看，国际能源结构由传统的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由高碳能源走向低碳、零碳能源为大势所趋，新能源的发展也成为各国新的经济增长点。

二、国际能源的趋势预测与展望

（一）国际能源近期趋势预测

1. 原油近期预测

美国能源局 EIA 在其月度《短期能源展望》报告中称，美国原油产量将持续升高。由于油价高企促进私有企业投资，EIA 预测美国原油产量在未来两年将增加 9% 左右（见图 2-4）。OPEC 原油产量预期在未来两年也将回升，恢复到疫情爆发前水平（见图 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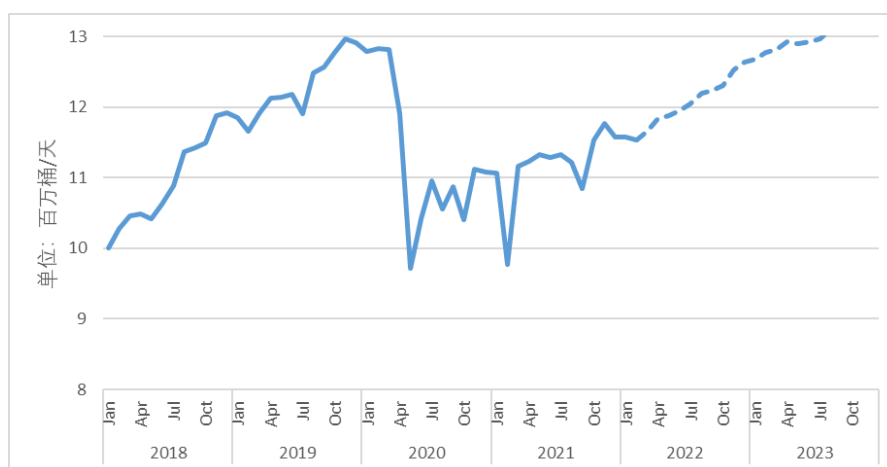


图 2-4：美国原油产量（来源：E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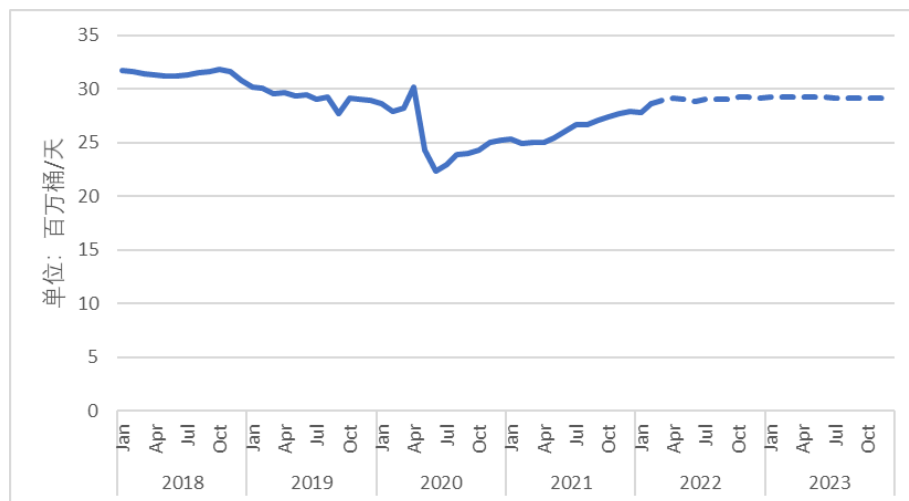


图 2-5: OPEC 原油产量 (来源: EIA)

油价方面, EIA 预测原油价格 2022 年维持在\$83/b, 随着原油供给大幅提升, 2023 年油价将回撤 18%至\$68/b。美国 Ryder Scott 公司预测 Brent 油价在 2022 年将达到\$75/b, 并将在未来 25 年升高至\$100/b 以上。两方预测都基于一定假设, 且不确定因素的存在, 譬如中东地区的冲突, 使得原油价格走势难以准确预测。

2. 新能源近期预测

得益于成本下降和政策持续支持, 国际能源署在其《可再生能源 2020 至 2025 年的分析和预测》报告中表示可再生能源将继续保持扩张的基本面, 并将在 2025 年占到全球发电容量净增长的 95%。其中, 太阳能光伏和风能总装机容量有望在 2023 年超过天然气, 在 2024 年超过煤炭, 合计达到 2148GW。

各类低排放燃料, 如现代生物能源和氢基燃料的利用需求在 IEA 基于各种情景下的预测均有所上升。2020 年, 生物燃料的使用量略低于 200 万桶/日, 但到 2030 年, 生物燃料的使用量在既定政策情景 (STEPS) 下将翻一番, 在净零排放情境 (NZE) 下将增加三倍。到 2030 年, 现代形式的固体生物能源的使用将增加 30-70%。在净零排放情境下, 沼气在 2030 年将为 4 亿人提供清洁的烹饪燃料, 沼气总需求将上升至 5.5 EJ (见图 2-6)。

IEA 根据承诺政策情景预测, 到 2030 年, 低碳氢气和氢基燃料的使用会有小幅增长。在承诺目标情景 (APS) 和净零排放情境下, 低碳氢气和氢基燃料的需求会更快地上升, 因为它们的使用为电力部门提供了更多选择, 目前已投入使用的氢气可被低碳氢气所取代, 它们的用途也会越来越广泛。在净零排放下, 2030 年大约一半的低碳氢气会产自电解, 一半来自配备 CCUS 的煤炭和天然气, 但这一比例在各国之间有很大的差异, 主要取决于各国低碳氢生产技术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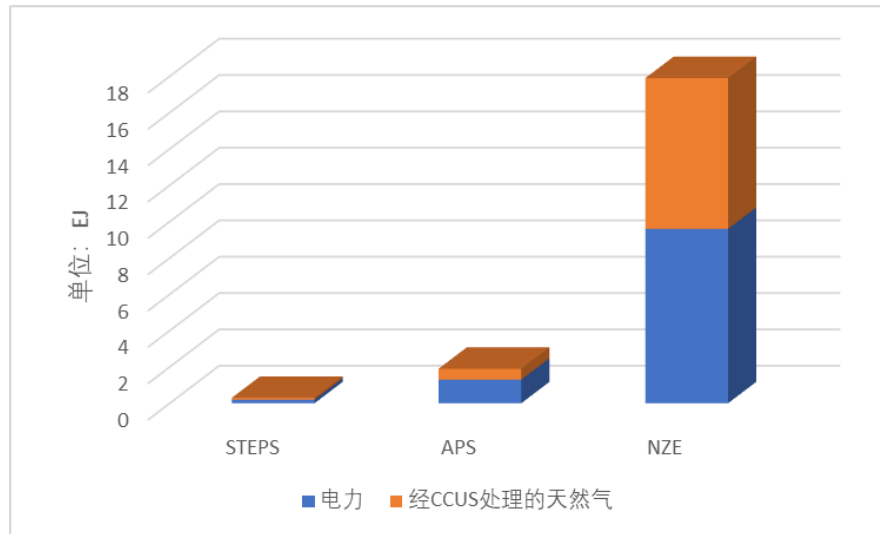


图 2-6: 低碳氢和氢基燃料在 2030 年各情境下的供应

(来源: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

(二) 国际能源远景展望及启示

1. 国际能源远景展望

(1) 国际能源转型持续推进

尽管面临国际形势等一系列不确定因素，但全球各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为应对气候变化和实现碳中和目标而采取措施的需求是确定的，相关共识、政策等的落实将推动新能源的发展以及能源格局的中长期转型。

● 气候变化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 26 次缔约方大会 (COP26)

COP26 峰会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至 11 月 13 日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会议旨在推进《巴黎协定》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目标达成。代表近 200 个国家的 COP26 缔约方一致达成《格拉斯哥气候公约》。缔约方大会就《巴黎协定》达成最终共识，升温维持在 1.5 °C 的目标不落空，并呼吁所有国家在 2022 年底前重新审视并加强其国家自主贡献的 2030 年目标，以完成这一温度目标。同时，大会首次就逐步减少未减排的煤电达成了一致立场，并承诺停止和逆转毁林、减少甲烷排放、加快向电动汽车的转型。在适应气候变化影响方面，各国在大会上同意了一项新的《格拉斯哥-沙姆沙伊赫全球适应目标工作方案》，以减少脆弱性、加强韧性，并提高人类和地球适应气候变化影响的能力。气候融资提供方也针对提高适应能力问题作出了具体承诺，包括承诺到 2025 年将适应资金在 2019 年的基础上增加一倍，这是全球首次就适应的具体融资目标达成一致。除承诺加大适应资金支持力度外，发达国家每年筹集 1000 亿美元气候融资的承诺也在格拉斯哥得到了深化，缔约方首次同意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提交一份关于实现 1000 亿美元目标进展的报告，确保发展中国家拥有发言权，并进一步巩固信任。并进一步商定了将以何种方式就新的 2025 年后气

候融资目标达成共识，建立了一个特别工作项目，为长期融资提供了保障⁶。

● 2050 年净零排放战略 (Net Zero)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中 1.5°C 的温升目标，人类需要在 2050 年前实现“净零排放”，即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和从大气中吸收的温室气体相等，不会有新的温室气体排入大气。根据 Energy & Climate Intelligence Unit 统计，截至目前，全球已有 132 个国家和 116 个地区提出了净零排放目标。其中大部分计划在 2050 年实现，如欧盟、英国、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已经在法律层面实施净零排放战略；也有包括中国在内的诸多国家在政策文件层面承诺贯彻此战略，如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计划于 2050 年完成目标，而中国宣布将努力争取于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其中，中石化和中石油作为全球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二，同时也是中国国内化石能源龙头企业，均积极响应世界能源革命趋势和国家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力争在 2050 年实现近零排放，助力国内能源转型进程。

(2) 煤炭、石油供给明显下降

石油、煤炭等传统化石能源的消费量在未来会明显下降，全球清洁能源的消费量，包括天然气和新能源，会持续上升。

国际能源署在其 2021 年全球能源展望模型中预测全球煤炭需求量将大幅度下降，与 2022 年相比到 2050 年将下降约 28%。同时，在 IEA 净零排放情境下，石油消费量在 2050 年将降低约 78%。其他机构，如 OPEC 和 Platts 也均预测石油消费量将在 2030-2035 年左右达到峰值后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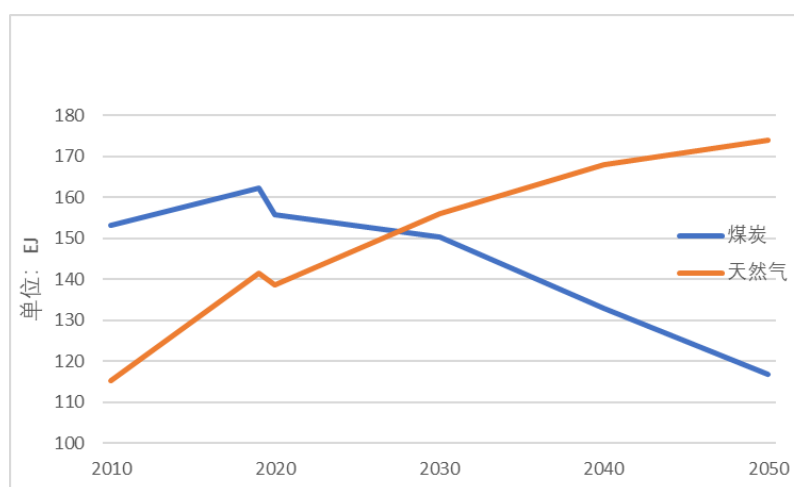


图 2-7：全球煤炭及天然气需求

(来源: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

(3) 清洁能源供需均大幅增加

天然气为相对清洁的能源，且液化天然气能够实现远距离运输，成本下降，利用天然气进行发电的技术相对成熟，一系列优势使得天然气的需求将大幅度、较快上升。2020-2030 年被美国能源界视为天然气发展的黄金阶段，在此阶段煤炭需求下降，而新能源发展尚不够充分，需要天然气弥补

⁶ COP26. Glasgow Climate Pact[R]. <https://ukcop26.org/the-glasgow-climate-pact/>

能源缺口。IEA 预测到 2050 年天然气的需求较之 2022 年将上涨 25%（见图 2-7）。

全球对于清洁能源的投入力度将不断加大。根据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 IRENA 预测，从 2016 年到 2050 年，将有累计 38 万亿美元的资金投资于可再生能源系统建设，以及 27 万亿美元的电气化和电能存储与电网基础设施系统投资。国际能源署在其《2021 年全球能源投资》报告中指出，在既定政策情境下，全球清洁能源投资将在 2021-2025 年占到能源总投资的 42%，并在 2026-2030 年上升至 47%；其中，发达经济体对应的两项数字分别为 49%和 56%；除中国外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为 27%和 32%；而中国将能达到 56%和 6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⁷。

清洁能源技术也将不断革新。IRENA 将技术创新阶段分为四个，第一阶段为初创模型，第二阶段为模型演示，第三阶段为早期应用，第四阶段技术走向成熟。目前新能源领域，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已经处于三四阶段过渡，规模经济正逐步实现，但如生物能源、氢能等仍处于一二阶段，碳捕获、利用与封存（CCS、CCUS）等技术也基本处于第二阶段。随着研发力度的加大，技术将进一步革新。

同时，清洁能源领域在未来将会有大量劳动力投入。到 2050 年，能源领域的工作岗位预计增加八百万，且 80%增加在太阳能和风能领域。全球范围内，增长主要集中在亚洲、北非、中东、美国和部分拉美地区。

根据 Solow 长期增长模型，投资、劳动力以及技术投入的三重增长会带来产出的增长，因此可以预见全球范围内，新能源产出将十分巨大，并进一步推动传统化石能源向新能源转型。在未来 20-30 年，国际新能源的快速发展以及能源格局的变化是基本可以确定的。

2. 政策性启示

中国将碳达峰碳中和纳入“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在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降低 18%的目标，落实 2030 年应对气候变化国家自主贡献目标，锚定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2022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落实碳达峰行动方案。为实现中国“碳中和”目标，新时代的中国能源发展需选取化石能源清洁利用与清洁新能源利用并重的发展路径和发展模式。

基于国家战略规划和各部委行动方案，中国能源转型可以多层次、全方位发力。从供给侧看，中国能源转型可以按照“洁煤稳油增气、大力发展新能源”的战略方针，不断提升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水平，逐步推动新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稳步推进能源资源型向能源技术型转型，最终实现“新能源”+“智能源”的中国能源体系。考虑到中国石油较高的对外依存度，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这一替代进程需要加快。

除了供给侧向清洁化持续发力外，需求侧同样需要开展绿色低碳转型⁸。促进绿色消费，推广高效节能电机、节能环保汽车、高效照明产品等节能产品。扩大绿色消费市场，加快畅通绿色产品流

⁷ IEA. Investment Data Explorer[R/OL]. <https://www.iea.org/articles/investment-data-explorer>

⁸ 普华永道.中国“碳中和”政策现状与趋势分析[EB/OL]. <https://pwc.to/3xtUdHi>.

通渠道，鼓励建立绿色批发市场、绿色商场、节能超市等绿色流通主体⁹。此外，金融、科技、生态等辅助领域也可助力双碳目标实现。银行金融业机构推进绿色金融，认真落实绿色信贷指引，积极开展绿色消费信贷业务，加大对碳减排投融资支持¹⁰；企业加强绿色低碳技术研发，做好绿色技术储备，加快先进技术成果转化应用。在供给侧及需求侧共同多层次、全方位发力下加速新时代能源转型。

三、参考文献：

- [1] 董秀成,董康银,窦悦.后疫情时代全球能源格局演进和重塑路径研究[J].中外能源,2021,26(03):1-6.
- [2] 董煜.工业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动态关联性研究[J].工业技术经济,2020,39(07):100-106.
- [3] 黄晓勇.世界能源发展报告 2021[R].北京,2021.
- [4] 刘喜梅.世界主要能源市场与价格形势分析[J].海外投资与出口信贷,2019(04):32-35.
- [5] 马丁,单葆国.2030年世界能源展望——基于全球能源展望报告的对比研究[J].中国能源,2017,39(02):21-24.
- [6] 魏一鸣,廖华.能源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
- [7] 杨松梅,王婕.全球能源格局发展现状及未来趋势[J].国际金融,2014(03):44-51.
- [8] 张所续,马伯永.世界能源发展趋势与中国能源未来发展方向[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19,32(10):20-27+33.
- [9] 邹才能,何东博,贾成业,熊波,赵群,潘松圻.世界能源转型内涵、路径及其对碳中和的意义[J].石油学报,2021,42(02):233-247.
- [10]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1[R]. London, 2021.
- [11] IEA. Renewables 2020[R]. Paris, 2020.
- [12] 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21[R]. Paris, 2021.
- [13] IEA. World Energy Investment 2021[R]. Paris, 2021.

⁹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促进绿色消费的指导意见》，2016，<http://www.gov.cn/xinwen/2016-03/02/5048002/files/e0d02a75cff54a3fb51e59295d852245.pdf>.

¹⁰ 陈骁,郝博韬.碳金融专题报告：中国碳市场的金融化之路，新浪财经，2022，<https://finance.sina.com.cn/stock/stockzmt/2022-03-24/doc-imcwiwss7922970.shtml>.

第三章 WTO 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条款研究：基于地位、待遇和责任的三元视角¹¹

李锋¹²

【摘要】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待遇，力所能及地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当做到原则性问题不放弃，利益性共赢要争取，技术性分歧促和谈，策略性取舍谋发展。基于事实和规则，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是坚定立场，丝毫不动摇；出于利益和发展，中国原则性坚持特殊与差别待遇，但策略性取舍部分利益，绝不被动妥协；为了世界和未来，中国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愿意在具体谈判中做出更大贡献，展现大国风范。

【关键词】发展中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WTO 改革

发展中国家条款，在全球经济体系和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既是经济问题，也是技术问题，但时至今日在很多场合被贴上了政治标签，具有些许外交色彩。

一、引言

回顾历史，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影响世界贸易组织发展和改革的重要因素。多哈回合谈判搁浅，世贸组织的地位和作用不断受到质疑和挑战；上诉机制陷入停摆，世贸组织的争端解决功能彻底瘫痪。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利益诉求，如何满足不同经济体的产业发展需求，如何据此制定并执行公平合理的世贸组织规则。

问题的缘由在于地位变化。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以及贸易获益的大小不一，是导致这一问题逐渐凸显的客观因素。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发达经济体占全球 GDP 和货物贸易出口的比重，从 1970 年的 82.6% 和 68.2% 分别下降到 2020 年的 59.5% 和 54.2%，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快速增长，这既是既定事实，更是长期趋势。体现在世贸组织规则领域，发达经济体需要改变原有规则以巩固地位，发展中经济体也需要改变规则以争取更多利益。

问题的起点在于国家身份。身份认同是参与国际事务包括全球贸易的第一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是决定待遇和责任的基础性问题。国情决定身份，身份决定待遇，这一简单的逻辑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看似简单实则复杂，不仅跟经济和贸易直接相关，也夹杂了一些政治和外交因素。世贸组织对这一问题的简单化处理为后续的改革埋下了隐患。

问题的焦点在于待遇公平。不同的国家身份享受不同的贸易待遇，这是早在关贸总协定时期就确立起来的贸易规则，时至今日显然已不能适应贸易格局的新变化，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对发展中国家待遇问题有各自不同的理解，都希望从公平公正的原则出发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问题的内容涵盖责任义务。权利和义务的不可分割性在世贸组织框架下也有所体现，基于身份享受待遇，找准定位承担责任。国情和实力的差别，使得不同经济体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理应承担有

¹¹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投资合作的规则体系研究》（20ZGB003）。

¹² 李锋（1984-），男，山东潍坊人，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国际经贸政策、对外直接投资与跨国公司。电话：13810206916，E-mail：lifeng@cfau.edu.cn。通讯地址：北京西城展览馆路 24 号外交学院国际经济学院，邮编：100037。

所差别的责任和义务，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很多责任和义务也是非强制性的。但部分发达国家对这一常识性逻辑表达了不同意见，强词夺理地讲了很多假大空的道理。

问题的终点远不止 WTO。这一问题不仅存在于世贸组织，也不仅存在于多边层面和贸易领域；既不是世贸组织引发了这个问题，也不能仅靠世贸组织就妄想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

二、发展中国家地位

关于发展中国家的界定，是经济和技术问题，更是历史遗留问题。目前国际上没有关于发展中国家的准确标准和技术指标，国际组织大都按照过去约定俗成的做法进行发展阶段的划分。¹³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是不争事实，也是中方原则。

1、合乎规则

世界贸易组织本身并没有关于发达还是发展中的标准界定，各成员国可以根据本国情况自主界定国家发展阶段或身份地位，当然必须要有理有据，而且能经得起其他成员国的挑战和质疑。¹⁴从复关到入世，中国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谈判，发展中国家身份由中方提出、各方商定，最终是达成一致意见的共识。因此，中国是规则遵守者，我们的发展中国家身份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合乎规则的。

欧美发达国家是传统经贸规则的制定者，但也是现有经贸规则的破坏者，原因无非是时过境迁的实力对比，尤其是大国崛起的中国因素。而我们中国，不管是过去的被动接受，还是如今的主动融入，始终都是全球经贸规则的遵守者和贡献者。关于发展中国家身份这一问题，世界可以有争议和质疑，这是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机构所允许的，但应该在规则的框架下通过协商谈判解决问题，而绝不应该是单边主义的歧视和制裁¹⁵。既然有法可依，那就照章办事，中国这么说，也是这么做。

2、合乎国情

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按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还远谈不上发达经济体，因为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发展体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普遍较高，人均 GDP 或人均国民收入也相对较高。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统计数据，2018 年按现价美元计算的人均 GDP，发达经济体的平均值为 46535 美元（美国：62625 美元），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值为 5431 美元（中国：9532 美元），中国位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上水平，但距离发达经济体还有一定差距。其次，发达国家的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也相对较高，中国整体以及部分行业依然还不能望其项背，不管是全球价值链的视角还是投入产出的指标，中国仍处于发展和赶超的阶段，这跟经济体量无关。最后，中国的经济发展呈现出差异性很强的不平衡性，不管是产业成熟程度还是区

¹³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根据 1964 年首次会议时的各国情况进行国家发展程度划分，虽沿用至今，但反映的是当时的时代特征和国家诉求，与宏观经济发展现状或目前排名可能并不相符。

¹⁴世界贸易组织网站，https://www.wto.org/english/tratop_e/devel_e/dlwho_e.htm（访问日期：2020 年 7 月 7 日）。

¹⁵2020 年 2 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在反补贴法的执行中重新认定发展中国家，主要考虑三方面因素，一是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 12375 美元），二是世界贸易份额（全球贸易份额占比低于 0.5%），三是其他因素（非 OECD 成员国以及申请加入 OECD 的国家、非欧盟成员国、非 G20 国家）。

域发展状况都迥然不同，部分行业、个别城市可能接近于欧美发达国家水平，但大部分行业和城市依然处于发展中阶段。

十九大报告也强调了中国的发展中身份，提出了两个没有变，即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3、现实困境

与其他国际机构相比，世界贸易组织在发展阶段或国家身份的认定方面处理得过于简单，自我认定的静态规则无法适应世界形势的动态变化，其一缺少技术标准难以进行准确量化，其二缺失“毕业制度”难以体现国家发展。一方面，任何一种技术性衡量标准都不能严谨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全貌，而且有可能将部分国家进行错误的归类划分；另一方面，国家也在不断发展变化，部分国家可能从发展中国家跃升到发达国家，如何界定或评判这种“毕业”就成为另外一个棘手的难题。

国家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可以说是全世界的通病和难题，短期内无法解决，世贸组织也是有心无力。我们中国对此也做出实践努力、提出改革方案，但这需要世界各国的协商一致。

4、坚定立场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这一基本判断，合乎国际规则和中国国情，体现了中国的国情地位和利益诉求，更重要的是中国代表着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自身，更为发展中国家群体争权益谋福利。WTO 成员国中绝大多数是发展中国家，但现行的贸易规则体系依然是二战后以欧美发达国家利益为标尺确立起来的，还存在一些不合理不公平的条款，需要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利益申诉和权益维护，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利益维护过程中的作用举足轻重，发展中国家群体需要中国这位老大哥进行国际发声和利益代言，这种利益代言的角色和地位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历史选择。不管是国情还是规则，无论是为自己还是为大家，中国坚持发展中国家地位的立场是坚定的，丝毫不动摇。

三、发展中国家待遇

对于非发达经济体（包括发展中经济体和最不发达经济体），为了鼓励其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国会给予特殊与差别待遇（Special and Differential Treatment），体现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发展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满足了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

1、关乎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发展中国家地位意味着特殊的优势和优惠的待遇，比如更长的政策过渡期、特殊的市场准入、普惠制关税等。跟发达经济体相比，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量、产业基础、技术水平、政策体制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距，需要发展时间和政策空间，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关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合理的全球化选择。对中国而言，很多行业和贸易产品仍处于价值链低端，大而不强的贸易地位的确需要特殊与差别待遇。

回顾历史，传统发达国家在其发展阶段更多地采用了单边主义的做法，如幼稚产业保护政策、

超保护贸易政策、战略性贸易政策等，发展中国家也曾使用过进口替代贸易政策。这些单边主义的政策举措，既不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地球村的整体利益，又因其损人利己或以邻为壑的效果影响而容易招致报复制裁甚至贸易战。经过协商一致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是一种友好的全球化发展路径，虽然表面来看貌似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但友好协商的政策安排更有助于全球贸易，在价值链贸易体系中对参与各国显然都是大有裨益的。

2、据理力争

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虽然发展中国家可以享受特殊与差别待遇，但这些“最佳努力条款”不见得一定能够兑现，根据中国商务部统计，在现行 16 个 WTO 协定 155 个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中，至少有 105 条过于宽泛而不具可操作性，占比高达 67.7%；剩余 50 条中，有至少 25 条为过渡期或技术援助条款。也就是说，现有协定中直接关乎成员权利和义务的特殊与差别待遇条款（25 条）仅占全部条款的 16.1%。¹⁶不仅如此，某些成员国可能并不认同部分发展中国家的身份继而剥夺了相应的特殊待遇。

2019 年 1 月，美国向世贸组织提交《一个无差别的世贸组织：自我认定的发展地位威胁体制相关性》，之后又据此提出一份总理事会决定草案，要求取消一大批发展中成员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的权利。2019 年 7 月，美国发布《改革世界贸易组织发展中国家地位备忘录》，指出近三分之二的世贸组织成员将自己定义为发展中国家以获得特殊待遇，认为其中有些并非真正的发展中国家，这种现象损害了其他 WTO 发达经济体和真正需要特殊和差别待遇的经济体。¹⁷欧盟、挪威等经济体在基本立场和政策目标上与美国一致，但在具体解决办法上则趋向务实，如挪威 2019 年提出“中间道路”，不支持就发展中国家地位进行无谓的政治讨论，应务实讨论不同发展中国家在谈判中的不同贡献。¹⁸

为了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以及中国自身利益，2019 年 2 月，中国、印度、南非和委内瑞拉联合向 WTO 提交了《惠及发展中成员的特殊和差别待遇对于促进发展和确保包容的持续相关性》。2019 年 5 月，中国向 WTO 提交了《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明确主张保障发展中成员的发展利益，纠正世贸组织规则中的“发展赤字”，解决发展中成员在融入经济全球化方面的困难。

3、策略性取舍

巴西、韩国等部分国家迫于美国压力，放弃了发展中国家待遇。但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既不能屈服于国际压力完全放弃，又不可一味死守不知变通。发展中国家地位决定了中国可以合理合法地享受发展中国家应有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但在部分领域我们可以量力而行地选择放弃，如中国已经

¹⁶张向晨大使在 2020 年 10 月总理事会上的发言，<http://wto.mofcom.gov.cn/article/xwfb/202010/20201003007643.shtml>（访问时间：2020 年 10 月 29 日）

¹⁷管健，WTO 改革综述之四：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待遇，https://mp.weixin.qq.com/s/39SWUXHXzSQ5zywima_1YA（访问时间：2020 年 4 月 29 日）

¹⁸卢先堃，关于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问题的几点思考，发展中国家地位和特殊与差别待遇：改革与对策热点专题视频研讨会，对外经济贸易大学，2020 年 4 月 11 日。

主动放弃了《贸易便利化协定》中的 C 类措施（技术援助）。

我国还可以选择某几个行业进行尝试性的待遇放弃，可以是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端制造或高科技行业，也可以是经常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的中低端行业。虽然目前国际上没有发展中国家的毕业制度，但未来改革肯定会涉及此议题。更重要的是，中国既有目标规划又有发展潜力，未来也必将升级到发达国家行列。既然终究会发生，那就应该未雨绸缪，但必须量力而行做好试点，而且必须明确表明立场和态度：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相应的待遇理应享有；中国可以选择主动放弃，进行策略性取舍，但绝对不会被动妥协。

四、发展中国家责任

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从未推脱过自身责任，但绝对不接受强加的过度责任，愿意在具体谈判中做出更大的贡献。

1、大国责任

中国言而有信，切实履行入世承诺；中国包容开放，坚定支持多边贸易；中国利己利人，努力服务世界经济；中国奋发自强，积极深化改革开放。中国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中国与 WTO 及其他成员经济体的共荣共生。

中国作为发展中大国，已经承诺并承担了远高于一般发展中国家的大国责任，如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对外援助和无息低息贷款等，并且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体现了大国责任和大国风范。互利共赢的“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务实合作造福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独一无二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为很多国家解决了国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发展困境。在全球经济持续低迷的大背景下，中国没有采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等政策工具，避免了以邻为壑的尴尬局面，而是将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应用于国际经济与贸易实践，为世界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

2、力所能及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第四章“贸易与发展”明确提及，不应期望欠发达缔约方在贸易谈判过程中，做出不符合它们各自发展、财政和贸易需要的贡献。WTO 框架下各成员国责任共担，但应当强调发达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展中国家在保障自身发展的前提下量力而行地履行责任做出贡献。

例如，产能建设中的节能减排问题，中国就明确表示反对碳关税。碳关税主要是发达国家对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的一种进口关税。碳关税不仅违反了 WTO 的基本规则，也违背了《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气候变化领域“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节能减排，中国一直在努力；但碳关税实属不公平贸易行为，这种超出发展中国家能力范围之外的责任不应当强加于我们。

五、对策建议

为了更好地维护我国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和待遇，力所能及地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应当做到原则性问题不放弃，利益性共赢要争取，技术性分歧促和谈，策略性取舍谋发展。

1、三位一体、综合权衡

基于事实，我们坚守发展中国家身份；民族复兴，我们不放弃原则性待遇；互利共赢，我们勇于承担大国责任。上述三点内容应该是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不应单独割裂任何一点，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和国际局势进行综合权衡，应当用求同存异的外交原则理性地看待发展中国家条款。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原则性待遇和基本的责任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是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共性；同时中国还是发展中大国，某些特殊待遇中国可以选择性放弃，更多的责任和贡献中国也勇于承担，这是中国个性，体现了大国风范，但前提依然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责任和贡献不能超出中国的国情现状和能力范畴。

2、整体改革、试点推进

就发展中国家条款本身，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发展中国家享有的基本的制度性权利，中国可以主动放弃但不应被剥夺权利，这也只是世贸组织改革的议题之一。事实上，WTO 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也不应以偏概全，上诉机制、市场经济地位、发展中国家地位和待遇、透明度、强制技术转让等议题都急需改革，更重要的是改变过去不合理的制度安排（强权政治，以发达国家利益为中心），顺应新时代的发展潮流（和平发展，发展中国家地位稳步提升），因此需要整体推进改革，坚持问题导向，以具体议题为切入点，从本质上解决公平性的问题，使自由贸易提升到公平贸易，而且这种公平一定是全球性公平，绝非少数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公平。具体而言，发展中国家条款的试点性调整，可以结合具体议题谈判（比如正在进行的渔业补贴谈判）进行先行先试，也可以通过倡议的方式进行原则性的指导，还可以先在部分国家或诸边/区域谈判中进行大胆尝试。

3、在商言商、经济视角

贸易议题、特殊与差别待遇，这本是经济问题，但出现了泛政治化倾向。事实上，与中国有关的很多经济议题，都被染上了政治色彩，西方发达国家带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国的和平崛起，怀揣霸权思维对中国百般刁难。在发展中国家条款这一问题上，我们应当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事论事地进行理性抉择，让问题回归事实，用经济达成共识，忌政治误导决策，通过互利共赢的经贸合作消除分歧和误解，坚持用经济手段化解经济问题。

4、中美经贸、重点突破

当下的中美经贸关系，既影响中美两国，又影响世界经济，还左右全球规则。在发展中国家条款这一问题上，美国反对声音最响、动作最大，但其本质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利己主义做法。美国真正在意的是美国自身利益，甚至不惜采取进攻性的贸易政策，足以看出美国并不在意规则和手段，要的仅是结果。美国作为全球经济霸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美关系的好坏和经贸

谈判的进展将至关重要，需要中国不卑不亢地据理力争，策略灵活地主动争取，将中美关系引向有利于全球规则和经贸轨道的轨道上来。

六、参考文献

- [1]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与世界贸易组织，2018年。
- [2] 中国商务部，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2019年。
- [3] 张向晨、徐清军、王金永 WTO 改革应关注发展中成员的能力缺失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1期，9-33页。
- [4] 彭德雷、周围欢、屠新泉，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发展中国家地位问题研究：基于历史、现实与规范的多维考察，太平洋学报，2020年第1期，64-75页。
- [5] 顾宝志，WTO 发展中成员地位改革及中国应对建议，国际贸易，2020年第1期，38-43页。
- [6] 杜明、李红波，GATT/WTO 体制中特殊和差别待遇的历史考察，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8期，69-74页。

第四章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出口不稳定性的实证研究——以中国制造业行业为例

邹赫¹⁹

【摘要】 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出口收入不稳定性的机制，以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为视角，测算 1992-2018 年出口收入不稳定指数和出口技术复杂度，分析二者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运用系统 GMM 方法实证研究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显著为负，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复杂度是降低制造业整体出口不稳定性的关键；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不稳定的降低更具有积极作用；2008 年金融危机削弱技术复杂度降低出口不稳定水平的作用；出口商品结构专业化、市场结构多样化、引进外商直接投资、行业内企业数目增加、减少进口贸易和降低资产贡献率等均有利于减弱出口收入不稳定性。

【关键词】 出口不稳定性；出口技术复杂度；制造业；系统 GMM

出口收入不稳定性不利于一国经济增长，破坏国际收支平衡，增加失业率，降低个人收入水平。减弱出口收入不稳定性，已经逐步成为一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关系到一国长期经济增长的不是出口“多少”，而是出口“什么”，即出口高技术复杂度的产品。本文将出口收入不稳定性与出口产品技术复杂度联系起来，试图考察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收入不稳定性的影响，从技术复杂度的角度应对出口收入不稳定性。

一、文献综述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国外学者就对出口不稳定性的成因进行了研究。Massell（1964）等研究发现，出口市场集中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出口市场集中度越高意味着出口市场自由度下降，与出口不稳定性呈正向关系；另一方面，一国出口市场高度集中也极有可能平滑出口收入波动，这主要是因为双边的贸易安排所致。Murray D（1978）从价格、数量波动以及需求和供给的角度分析出口收入不稳定性的原因，认为数量波动和供给方面的因素是导致出口收入波动的主要原因。Love（1986）研究发现商品集中度同出口不稳定性之间存在显著正向相关性。Tege ne（1990）基于 Love 的研究，研究发现出口集中度的增加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还要关注主次出口市场间波动的相关关系。Lancieri E（2014）研究发现一国的出口规模、经济规模、经济发展水平、出口增长率、GDP 增长率、投资增长率与出口收入不稳定性负相关。国内的相关研究起步较晚，许安心（2009）的研究发现中国水产品五大出口市场中的三大亚洲市场—日本、韩国和香港市场决定了其出口不稳定性的绝大部分，而不断扩大的美国和欧盟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平抑亚洲市场的冲击。祝树金（2014）等人研究发现出口技术结构对 OECD 国家出口不稳定性存在显著影响。周定根（2019）研究发现易政策不确定性下降有助于提升出口持续时间，改善出口稳定性；高质量、高价格和差异化产品的出口稳定性有所提高。曹慧平（2020）等人研究发现，目的国良好的契约环境通过

¹⁹ 邹赫（1985.11-），女，山东省烟台市，经济学博士，中国电力技术装备有限公司，研究方向为对外直接投资、海外工程管理等。

提高社会信任水平和出口产品质量增加产品的出口稳定性。张永亮（2021）等人的研究发现，中国产品出口稳定性普遍不足，中等技术产品出口复杂度提升有利于提高出口关系稳定性，但处于比较优势的高技术产品复杂度提升时反而会增加贸易关系失败的风险。

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现有研究大多都是从国家层面或者单个产业层面研究出口收入不稳定性的成因或者后果，很少有学者从技术水平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中国制造业行业为例，考察行业层面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收入不稳定性的影响。

二、技术复杂度对出口稳定性影响机制分析

出口不稳定性主要是指实际出口值偏离长期趋势值的程度。技术复杂度主要通过价格作用机制、需求偏好机制以及收入提升机制三个方面对出口稳定性产生影响。

价格作用机制方面，出口产品收入主要取决于出口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技术复杂度的变动会引起产品价格的变动。一方面，技术复杂度提升会引发产品价格的上涨。另一方面，产品价格上涨会导致需求量的相对下降，因此，技术复杂度对于出口的影响取决于产品的需求弹性。

需求偏好机制方面，当产品价格提升是由于产品技术水平发生变化时，价格作用机制就会失效，主要是因为技术水平发生改进之后，消费者的需求偏好会发生改变，更加偏向于高技术水平的产品。因此，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导致消费者偏好水平发生变化，即消费者更偏好于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从而扩大对其需求量。

收入提升机制方面，消费者需求偏好与其收入水平相关。收入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更偏好技术复杂度较高的产品，而随着收入的提升，用于消费支出的比重也会增加。而国际市场上，消费者的收入水平提升能够扩大对于高技术含量消费品的需求。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会通过收入提升机制推动出口收入的增加。

三、行业出口不稳定性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测算与分析

1. 行业出口不稳定性

关于出口不稳定性的测量方法主要有指数趋势法、线性趋势法以及移动平均法。指数趋势方法主要是用于对各国出口程度之间的比较，早期大量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不稳定性的研究均采用此衡量方法，线性趋势方法在高速增长态势下的拟合度较弱，移动平均方法存在平衡不稳定因素的缺陷。本文参照在 Love（1986）基础上改进的指数函数形式测度我国各制造业行业出口不稳定性，其表达式如下：

$$EI_{it} = 100 \times [(\log X_{it} - \log X_{it}^*) / \log X_{it}^*] \quad (1)$$

其中， $\log X_{it}$ 为 i 行业 t 年实际出口收入额， $\log X_{it}^*$ 为其指数趋势估计值， EI_{it} 表示 i 行业 t 年的出口额对于长期趋势值的偏离程度。其中， $\log X_{it}^*$ 由以下模型计算所得：

$$\log X_{it}^* = \alpha + \beta t + \mu_t, t = 1, 2, 3, \dots \quad (2)$$

$$\log X_{it} = \alpha + \beta t \quad (3)$$

(1) 式计算的出口收入不稳定指数会有负数, 为了使得其均为正数, 对 (1) 式的计算结果取绝对值, 从而能够对出口收入对长期趋势值的偏离程度进行有效比较。

2. 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学者提出不同的方法度量出口技术复杂度。LALL 等人 (2006) 定义一种产品复杂度得分, 即所有出口这种产品的国家以贸易份额加权的平均人均收入, 其权重为每个国家出口额占世界出口额的比值, 但是以每一个国家的世界出口份额作为权重计算出口复杂度得分将会高估大国的复杂度, 而忽视了小国在某些产品上的比较优势。Rodrik (2006) 和 Hausmann (2007) 修正了前述指标, 以各国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指数为权重、对所有出口该种产品的国家的人均收入进行加权平均来计算出口产品的复杂度得分 PRODY; 然后以一国出口产品在该国出口中所占份额为权重, 对其所有出口产品 PRODY 进行加权平均得到该国各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 EXPY。本文采取这种方法计算出口技术复杂度。为计算得到我国各行业出口技术含量, 首先计算各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度得分如下:

$$PRODY_k = \sum_i \frac{x_{ik} / X_i}{\sum_j (x_{jk} / X_j)} Y_i \quad (4)$$

其中, i, j 表示国家或者地区; k 表示产品; $X_i(X_j)$ 表示总出口额; $X_i = \sum_k x_{ik}$, Y_i 表示国家或地区的人均真实 GDP。利用式 (5) 可以计算出 SITC Rev. 2 的三位码各种产品的技术复杂度, 然后根据 SITC 与 ISIC 的对应关系, 进一步以各国每种产品出口额占行业总出口额的比重为权, 得到该国所有出口产品技术水平的加权平均, 得到一国出口篮子的技术结构指数:

$$EXPY_s = \sum_k \left(\frac{x_{ik}}{X_i^s} \right) PRODY_k \quad (5)$$

其中 s 表示行业; X_i^s 表示 i 国或地区行业 s 的总出口额。

3. 数据说明

在测算产品技术复杂度和出口不稳定水平时, 本文采用 1992-2018 年按 SITC Rev. 2 的三位码分类²⁰的进出口产品数据, 国家 (或) 地区出口产品数据来源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数据库 (UN comtrade), 人均 GDP 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 WDI 数据库采用 2005 年不变美元价格。

四、实证分析

(一)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为了进一步阐述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作用, 且考虑到出口收入不稳定水平是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不仅取决于当前的一些影响因素, 也与前期出口收入不稳定水平相关, 因而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设定以下动态计量回归模型:

²⁰选用 SITC Rev.2 三位码的数据是为了和现有研究使用的数据保持一致, 从而更加具有可比性。

$$EI_{it} = \beta_0 + \beta_1 EI_{it-1} + \beta_2 EXPY_{it} + B_1 X_{it} + B_2 Z_{it} + v_i + e_{it} \quad (6)$$

其中，i、t 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EI_{it} 为前文计算的行业出口不稳定指数，EI_{it-1} 为其滞后一阶。EXPY_{it} 表示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X_{it} 为具有一定政策内涵的其他关键解释变量，包括出口商品集中度（Comcon）、市场集中度（Geocon）、行业出口势力（Worldshare）、研发水平（RD）、行业进口贸易（IMP）和外商直接投资（FDI），B₁ 表示相应的回归系数向量。Z_{it}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行业内企业数目（NUM）、行业劳动生产率（LP）、总资产贡献率（TRC）、界定要素密集类型的虚拟变量（TYPE1、TYPE2）和界定金融危机前后两个阶段的虚拟变量（CRISIS），B₂ 表示其回归系数向量。

出口商品集中度（Comcon）和出口市场集中度（Geocon）分别表示行业出口商品结构和市场结构，均采用基尼系数度量。利用 SITC Rev.2 三位码产品出口数据测算，其值位于 0-100 之间，值越小表明集中化程度越低，反之相反；行业出口势力（Worldshare）表示我国制造业行业出口额占该行业世界总出口额的比重，值越大表明其在全世界的地位越高，价格影响力也相对较高；研发水平（RD），采用各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占行业工业增加值表示；行业进口贸易（IMP），采用各行业的进口额占该行业工业增加值之比衡量，从一定程度上反映各行业的进口渗透对于出口不稳定水平的影响作用；行业外商直接投资（FDI），由于在数据统计方面的缺陷，很难获得我国细分行业的实际利用外资数据，本文采用行业外商直接投资及港澳台投资企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占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表示。研发水平（RD）和外商直接投资（FDI）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影响出口不稳定性需要一个过程，因此这些变量进入模型时采用其一阶滞后形式。关于控制变量，行业内企业数目（NUM），经济系统中从事成本发现的企业数目越多，则经济系统则越有可能接近生产前沿（Hausmann R et al., 2007），对出口不稳定性也产生影响；行业劳动生产率（LP），行业增加值与行业从业人数的比值；总资产贡献率（RTC）反映企业全部资产的获利能力，是各行业的（利润总额+税金总额+利息支出）除以平均资金总额得到，衡量资本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

本文采用 1999-2018 年中国制造业数据，为了去除数量级的影响，技术复杂度、行业内企业数目、劳动生产率采用对数形式。各行业固定资产净值、全部行业从业人数、企业单位数等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各行业工业增加值、外资企业固定资产净值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各行业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数据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各工业行业的进出口数据不能直接获得，根据前文 SITC 与我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的对应关系重新整理计算而得，各产品的进出口的原始数据均来自联合国 UN Comtrade 统计数据库，并采用当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平均汇率折算成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人民币值。最终所有的货币单位数据均以 2005 年为基准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进行了平减，以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也与出口技术复杂度计算中的人均收入的基准年限保持一致。

（二）实证结果分析

由于解释变量中包含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动态面板模型必然会导致内生性问题，使用普通的面板估计方法会使估计结果有偏且非一致。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系统 GMM 方法对模型

进行估计，所有模型都包含截面固定效应，结果见表 4-1。

表 4-1 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出口不稳定性的模型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L. EI	0.259***	0.254***	0.129***	0.129***	0.112***	0.111***	0.107***	0.0792***
	(0.0021)	(0.0022)	(0.0023)	(0.0019)	(0.0126)	(0.0127)	(0.0091)	(0.0083)
lnEXPY	-0.779***	-0.771***	-0.692***	-0.884***	-1.085***	-1.073***	-1.166***	-1.445***
	(0.0225)	(0.0376)	(0.0241)	(0.0536)	(0.216)	(0.172)	(0.219)	(0.247)
Comcon		0.0115***		-0.0712**	-0.0857**	-0.0906**	-0.0875**	-0.0893**
				*	*	*	*	*
		(0.0001)		(0.0023)	(0.0039)	(0.0041)	(0.0045)	(0.0071)
Geocon			0.0933***	0.135***	0.124***	0.123***	0.118***	0.109***
			(0.0001)	(0.0016)	(0.0041)	(0.0044)	(0.0036)	(0.0047)
Worldshare					3.246	5.673	-13.67***	11.72***
					(4.986)	(3.555)	(4.092)	(3.225)
lagRD					0.884			
					(2.863)			
IMP					0.124***	0.165***	0.198***	0.0869***
					(0.0415)	(0.0318)	(0.0280)	(0.0147)
lagFDI					-2.358***	-2.266***	-2.046***	-1.897***
					(0.273)	(0.255)	(0.296)	(0.400)
lnNUM					-0.0328**	-0.0332**	-0.121***	-0.0740**
								*
					(0.0154)	(0.0140)	(0.0161)	(0.0145)
lnLP					0.059			
					(0.108)			
TRC					0.0296***	0.0277***	0.0280***	0.00296**
					(0.0101)	(0.006)	(0.0083)	(0.0012)
lnEXPY×CR ISIS							0.0796***	
							(0.0075)	
lnEXPY×TY PE1								1.123***
								(0.265)
lnEXPY×TY PE2								0.559***
								(0.213)
常数项	7.899***	6.946***	3.692***	8.843***	13.37***	14.16***	15.44***	11.98***

	(0.217)	(0.315)	(0.207)	(0.524)	(1.794)	(1.512)	(2.106)	(0.933)
AR(2) 检验P 值	0.4406	0.4417	0.5228	0.5297	0.5357	0.5206	0.5079	0.5254
Sargan 检验 P值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注：括号内为回归系数的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统计显著

模型（1）-（8），出口收入不稳定水平的滞后一阶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出口收入不稳定性存在粘性，前期出口收入不稳定水平对当期产生正向的影响。模型（1）仅加入本文考察的核心变量技术复杂度，其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将降低出口收入不稳定性水平。模型（2）引入商品集中度，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商品种类越集中，出口收入不稳定性将越高。但是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出口商品集中度的系数则变为显著为负，即出口商品专业化程度越高有利于降低出口不稳定性水平。模型（3）引入出口市场集中度，该变量在模型（3）以及后面的所有的模型中均显著为正，表明出口市场越集中，出口不稳定性水平越高。我国制造业行业出口市场较为分散（基尼系数基本上在 50 以下），有利于出口稳定。模型（4）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放在一个框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的系数仍然显著为负，表明在出口商品集中度和市场集中度不变的情形下，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上升有利于降低出口不稳定性水平。模型（5）在模型（4）的基础上引入一些别关键变量和控制变量，行业出口势力的系数为正，但是不显著；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的系数均不显著，由于二者与行业技术水平关系较为紧密，可能与技术复杂度指标存在多重共线性，所以在后面的模型中去掉了这两个变量；行业进口贸易变量（IMP）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行业的进口渗透不利于出口稳定性；外商直接投资对出口不稳定性水平的影响显著为负，表明外商直接投资有利于提高行业的出口稳定水平；行业内企业数目（NUM）的系数显著为负，也意味着其与出口收入稳定存在正向关系，表明行业内从事成本发现的企业数目越多，该行业倾向于处于生产前沿水平，出口不稳定性越低；资产贡献率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资产或者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出口收入趋于不稳定。模型（6）在模型（5）的基础上去掉研发投入和劳动生产率这两个变量，其他变量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均与模型（5）一致。

模型（7）考察金融危机前后，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水平的影响差异。引入技术复杂度和金融危机虚拟变量的交互项，其系数显著为正，表明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技术复杂度对出口收入不稳定性水平的影响作用会被削弱，偏效应由-1.166 变为-1.0864。因此，金融危机对技术复杂度发挥作用产生消极的影响，但是金融危机后，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依然显著为负，仍然能够有效减少出口不稳定性。模型（8）考虑到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设定两个虚拟变量，TYPE1 表示技术密集型产业，TYPE2 表示资本密集型产业。将二者与技术复杂度的交互项引入模型，系数均显著为正，与金融危机的作用类似，技术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均削弱了出口技术复杂度降低出口不稳定性水平的作用，且技术密集型产业（1.123）的削弱强度要高于资本密集型产业（0.559）。反过来，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强了技术复杂度降低出口不稳定性水平的作用，也就是说，相对于技

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不稳定水平的抑制作用更大。劳动密集型行业本身出口技术复杂度较低，提升空间较大，技术密集型行业和资本密集型行业的技术复杂度的偏效应依然为负，分别为-0.346和-0.887。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层面，考察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行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出口不稳定性的影响显著为负，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技术复杂度有利于降低制造业整体出口不稳定性；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劳动密集型行业的出口不稳定的降低具有积极作用。

结合本文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大力提升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降低其出口不稳定性水平，对降低我国制造业整体不稳定性水平意义重大。我国在实行制造业强国的过程中，要加大研发投入、改进机器设备、培育人力资本，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2) 当前，我国正在积极推进自由贸易区战略，旨在构筑高水平的面向全球的自由贸易区网络。我国应当集约生产并出口我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通过签订多双边贸易协定寻求出口市场多元化，实现出口商品结构合理专业化和市场结构的多样化。

(3) 目前全球价值链分工面临调整和改变，同时我国也在积极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国内一些参与到全球价值链的企业可以加强同内销型企业的合作，国家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放开融资约束等渠道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提升出口制造业企业数量和质量。

六、参考文献：

- [1] Massell B F. Export concentration and fluctuations in export earnings: A cross-section analysis[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64: 47-63.
- [2] Murray D. Export earnings instability: price, quantity, supply, demand?[J].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1978: 61-73.
- [3] Lancieri E. Export instabilit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reappraisal[J]. PSL Quarterly Review, 2014, 31(125).
- [4] Love J. Commodity concentration and export instability: the choice of concentration measure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J]. The Journal of Developing Areas, 1986, 21(1): 63-74.
- [5] 许安心. 2009. 基于地理集中度的中国水产品出口不稳定性研究[J]. 国际贸易问题(6):30-36.
- [6] 祝树金, 张桑桑. 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变迁影响出口不稳定性的实证研究[J]. 财贸研究, 2014, 25(04):90-97.
- [7] 周定根, 杨晶晶, 赖明勇. 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关税约束承诺与出口稳定性[J]. 世界经济, 2019, 42(01):51-75.
- [8] 曹慧平, 王欣. 契约环境、社会信任与出口稳定性:基于目的国视角的研究[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0):32-44+135.
- [9] 张永亮, 刘子昂, 董聪, 杨跃翔. 技术复杂度、比较优势与出口稳定性[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06):95-99.

第五章 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

程健²¹

【摘要】产品质量是企业竞争力的核心体现，进口高质量中间品是提升产品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本文基于 2010-2019 年数据，研究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规模以及进口中间品与本国自产中间品的技术差距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都呈现倒 U 型特征。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而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据此，本文提出要合理控制中间产品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加大研发投入力度、适当调整贸易方向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中间产品进口；出口产品质量；技术差距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往来日益加强。2019 年以来，世界经济和贸易增长逐步放缓，但是我国对外贸易仍然表现出很强的韧性，呈现出总体平稳、稳中提质的发展态势。根据我国海关数据统计显示，2020 年，我国进出口总值超过 32 万亿元，增长 1.9%。与此同时，我国进口中间品的规模也在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中间产品的进口大约占当年进口总额的 50%-70%，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中间产品进口已经成为我国进口商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是我国推进贸易强国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我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体现。“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要在双循环格局下不断提升我国出口质量。许多研究已经证明，中间品进口与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存在较为密切的联系。一方面，进口高质量的中间产品能够有效缓解我国同其他国家之间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高质量中间产品的进口对于企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的提升都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且能够进一步有利于促进出口产品的质量提升和升级优化。因此，加强对中间产品进口与出口产品质量关系的研究，对我国出口贸易的转型升级以及外贸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相关研究文献评述

中间产品贸易在全球生产和贸易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关于中间产品进口的作用，张会清、唐海燕（2011）认为，企业在进口核心零部件的同时，可以获得发达国家的技术指导，进而带动技术水平的提高。王维薇、李荣林（2014）也认为，我国本土企业可以通过学习和模仿进口产品的技术来降低创新成本。李淑云（2017）认为，中间品进口主要通过产品的质量效应、种类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对企业的生产率产生影响。刘俊华（2020）认为，中间品进口对我国的技术创新具有积极作用，但不同中间品的影响不同。实证发现：通过进口初级产品和半制成品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各个区域的技术创新的提升，但是零配件的进口对技术创新产生了阻碍作用。韩纪琴、周靖（2020）实证研究中间品进口对污染排放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中间品进口可以降低污染排放率，并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推动污染排放降低。

²¹ 程健（1983.12），男，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对外贸易、对外投资。
邮箱：brett2004@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汇园 11 号

关于中间品进口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有：Amiti 等（2007）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规模和种类的扩大能够一定程度提升企业生产率，从而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Bas 等（2015）基于中国 2006-2013 年的数据，同样发现降低中间品进口关税可以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国内学者的研究方面：李秀芳（2016）研究发现，通过扩大中间品的进口种类，实现多元化发展，能够促进我国外资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但是对于本土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推动作用并不显著。许家云等（2017）研究发现，进口的中间品主要是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和产品种类及质量效应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吴艳芳（2018）研究发现，进口附加值较高的中间品能够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高静等（2019）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通过中间品进口规模扩大、质量增加、技术外溢效应等渠道提高企业的出口质量。其中，中间品进口质量对出口质量提升效应最稳定，而中间品进口技术外溢效应对不同类型企业出口质量提升效果差异性最大。宋跃刚、郑磊（2020）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主要是通过自主创新来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

通过对已有文献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对于中间品进口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但是对于中间品进口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还比较缺乏，并且已有的研究更多的集中于理论层面的研究，即使有部分实证研究，其使用的样本数据较旧，并且得到的结论也存在一定差异。鉴于此，本文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基于我国 2010-2019 年的相关数据，着重探究进口中间产品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模式和效果，从而为我国提升出口产品质量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

二、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理论分析

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积极采取措施促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2020 年 11 月，我国针对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出台专门的实施意见中明确提出要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强调扩大先进技术、重要装备和关键零部件进口。进口高质量的中间品有利于倒逼国内企业不断提升研发水平、提高产品质量，推动产品不断升级。因此，加强对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正负两个方面。正面影响主要是通过产品的质量效应、产品种类多元化效应以及技术溢出效应发挥作用。一是中间品的质量效应。企业从国外进口的高质量中间产品，是国外的生产企业投入了大量资金、技术、人力、经验等生产出来的，是高技术水平和高研发投入的一种体现，产品的附加值较高。因此，中间品进口的质量越高，本国生产的出口产品的质量也就越高，同时也有利于提高行业整体的质量标准，从而促进本国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二是产品种类多元化效应。本国出口产品的生产离不开大量中间品的投入，从国外进口中间品不仅能够丰富国内中间品的种类，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进口中间品的价格指数，同时还能够节省技术引进费用，成本降低意味着企业利润的增加，企业可以将这些节省出来的资金投入产品生产和质量提升的其他方面，从而不断推动产品质量提升；三是技术溢出效应。进口中间产品存在技术外溢的正外部性，高质量的进口中间品是国外的人力资本、先进技术以及研发成果的集中体现，企业通过

进口高质量中间品能够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研发成果，消化吸收国外行业在设计研发、生产管理、品牌管控以及营销等环节的增值服务，从而有效激励并推动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进而带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但与此同时，中间品的进口还可能通过创新抑制效应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负面的影响。虽然企业进口中间产品能够产生正向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是企业的技术创新主要来源于自主研发和从国外进口两种渠道，通常情况下企业自主研发的周期较长、投入较大，而从国外进口一方面成本要远远低于自主研发，另一方面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内就可以产生较为明显的效果，促进企业经营效益的提升，因此，进口中间品一定程度上会降低企业自主研发创新的意愿和能力，并且容易形成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不利于企业自身竞争力的提升，从而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产生负面影响。综合以上的分析，我们认为中间品进口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取决于正负两种影响力量的对比，提出第一个假设：

H1：中间品进口会影响出口产品质量，两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

虽然中间品进口能够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影响，但是影响程度并不确定，因此，对于中间产品的进口不能毫无限制，主要是由于中间产品技术溢出效应存在作用区间。如果进口中间产品同本国自产中间品在技术方面的差距较小，就不会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如果两者之间存在的技术差距过大，本国企业由于在人力、资源、技术等方面存在的不足一定程度上会限制对国外先进技术的高效学习和吸收，并不利于本国企业创新能力提升，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不会有明显的推动作用。因此，只有当本国自产中间品同进口中间品之间的技术差距处在一个较为合理范围内，技术溢出效应才能够提高本国出口产品的技术水平，进而提升出口产品质量。综合以上的分析，提出第二个假设：

H2：本国自产中间品与进口中间品之间的技术差距处于合理范围内才会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

三、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模型构建

（一）模型构建

根据前文提出的假说，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本文构建以下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ln Q_{kt} = C + \alpha_1 \ln IM_{kt} + \alpha_2 (\ln IM_{kt})^2 + \alpha_3 \ln X_{kt} + v_k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ln Q_{kt} = C + \beta_1 \ln GAP_{kt} + \beta_2 (\ln GAP_{kt})^2 + \beta_3 \ln X_{kt} + v_k + v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其中，k 和 t 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Q 表示出口产品质量，IM 表示中间品进口规模，GAP 表示技术差距，X 表示本文引入的一系列控制变量。 ε_{it} 为干扰项， v_k 、 v_t 为分别表示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模型（1）中引入中间品进口规模的平方项，主要是为了验证中间品进口规模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模型（2）中引入了技术差距的平方项主要是为了探讨技术差距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

（二）变量说明

(1) 因变量

出口产品质量 (Q)。目前, 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测度有很多方法, 基于本文的研究, 本文借鉴王明益等 (2014) 研究成果, 通过以下模型对出口产品质量进行测度:

$$\ln S_{cht} - \ln S_{0t} = \lambda_{1,ch} + \lambda_{2,t} + \alpha P_{cht} + \beta \ln NS_{cht} + \gamma \ln GDP_t + \lambda_{3,cht} \quad (3)$$

其中, c 为出口国, h 为 HS 十位码产品, t 为时间; $\lambda_{1,ch}$ 为产品固有特征, $\lambda_{2,t}$ 为仅随时间变化的产品特征; S_{cht} 为产品 h 占产品所在行业的市场份额, S_{0t} 为外部市场份额, $\ln S_{cht} - \ln S_{0t}$ 为 t 时间 c 国出口产品 h 的相对市场份额; NS_{cht} 为产品 h 占产品所在分组的份额, P_{cht} 为出口价格, GDP 为出口国人均国民收入。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 对上式进行如下变形:

$$\ln \frac{S_{cht}}{1 - S_{0t}} = \lambda_{1,h} + \dot{\lambda}_{2,t} + \alpha P_{cht} + \beta \ln \frac{NS_{cht}}{1 - S_{0t}} + \gamma \ln GDP_t + \lambda_{3,cht} \quad (4)$$

其中, $\dot{\lambda}_{2,t} = \lambda_{2,t} + \ln S_{0t} + (\beta - 1) \ln(1 - S_{0t})$ 。变形后, 可以通过贸易数据计算出口产品质量, 如式 (5):

$$Q_{cht} = \hat{\lambda}_{1,ch} + \dot{\lambda}_{2,t} + \hat{\lambda}_{3,cht} = \hat{\lambda}_{1,ch} + \hat{\lambda}_{2,t} + \hat{\lambda}_{3,cht} + \ln S_{0t} + (\beta - 1) \ln(1 - S_{0t}) \quad (5)$$

标准化的出口产品质量如下式:

$$\hat{Q}_{cht} = \frac{Q_{cht} - \min Q_{ht}}{\max Q_{ht} - \min Q_{ht}} \times 100 \quad (6)$$

(2) 自变量

1. 技术差距 (GAP)。本文基于 Xu (2007) 的研究成果, 通过出口技术复杂度对技术差距进行衡量, 公式为:

$$PRODY_{jh} = \sum_c \frac{x_{jh}/x_j}{\sum_c x_{jh}/x_j} Y_c \quad (7)$$

其中, X_{jh} 为产品出口量, X_j 为产品所在行业的出口总量, Y_c 为人均 GDP。通过产品出口技术复杂度, 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一步计算其所在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PY_{cj} = \sum_{jh} \frac{x_{jh}}{x_j} PRODY_{jh} \quad (8)$$

其中, $EXPY_{cj}$ 为中国 j 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技术差距 (GAP_j) 为两国同一行业技术复杂度的比值, 即 $GAP_j = EXPY_{ij} / EXPY_{cj}$ 。其中, $EXPY_{cj}$ 与 $EXPY_{ij}$ 分别表示我国与进口国 j 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该比值越大, 说明两国产品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相关数据来源于 CEPII BACI 数据库。

2. 中间产品进口规模 (IM)。将 HS 六分位编码同 BEC 编码进行对应, 从 CEPII BACI 数据库

中找到相对应的中间品代码，整理相关数据可以得到中间品进口规模。

3.控制变量。本文基于已有文献的研究成果，选取了部分控制变量，主要包括：行业出口份额（EXP），以行业出口额占行业销售总额的比重进行衡量；行业规模（Scale），以行业的总产值进行衡量；研发投入（RD），以行业研发的总投入额进行衡量；人力资本（Wage），以行业人均工资进行衡量；外商投资水平（FDI），以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重进行衡量。本文研究区间范围是 2010-2019 年，相关数据来源于我国历年工业经济统计年鉴和科技统计年鉴。

四、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影响的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 5-1 为基准回归结果。其中，第（1）列是对模型（1）进行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中间品进口规模的系数为正，且通过 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可以提升出口产品质量，但是中间品进口规模二次项的系数显著为负，说明中间品进口规模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呈倒 U 型特征，初步验证了假设 H1。第（2）列是对模型（2）进行的估计结果，可以发现技术差距的估计系数为正，且通过 5%的显著性检验，技术差距贡献率为 21.6%，表明技术差距能够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而技术差距二次项的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负，表明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呈倒 U 型特征，初步验证了假设 H2。

表 5-1 中的第（3）列引入了进口规模与技术差距的交乘项（ $\ln IM \times \ln GAP$ ），其系数在 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只有技术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扩大进口规模才会显著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另外，在所有回归结果中，模型中的各个控制变量出口份额、行业规模、研发投入、人力资本、外商投资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这些因素对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5-1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ln IM$	0.034*** (5.87)		
$(\ln IM)^2$	-0.029*** (-5.73)		
$\ln GAP$		0.216** (3.02)	
$(\ln GAP)^2$		-0.069*** (-5.18)	
$\ln IM \times \ln GAP$			0.014*** (4.72)
$\ln RD$	0.019** (2.35)	0.017** (2.74)	0.011* (2.18)
$\ln EXP$	0.079***	0.062***	0.057***

	(6.59)	(4.77)	(6.23)
InScale	0.084** (3.46)	0.081*** (5.12)	0.054*** (4.98)
InWage	0.124*** (5.27)	0.225** (4.22)	0.194*** (5.06)
InFDI	0.024* (2.25)	0.037* (2.06)	0.031* (2.19)
常数项	1.3275*** (6.52)	2.6684*** (6.17)	1.9906*** (5.99)
行业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年份固定效应	yes	yes	yes
R ²	0.412	0.388	0.361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 稳健性检验

为了验证以上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主要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样本检验,具体来说:

(1) 按进口来源地分组。根据我国产品出口目的地国家的发达程度对样本进行分类检验,具体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类,回归结果见表5-2所示。

从表5-2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间产品进口规模的一次项系数都为正,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在发达国家当中表现更为明显(参数估计值为0.022,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参数估计值0.036)。中间品进口规模二次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间品进口规模同出口产品质量呈倒U型特征,进一步验证了假设H1,说明前文回归结果是稳健的。技术差距的二次项系数均为负,且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虽然技术差距以及中间品进口规模同技术差距的交乘项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但是在不同类型的国家当中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在发达国家样本中,技术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与进口规模的交乘项参数估计值都为负,说明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存在负相关的关系;在发展中国家样本中,技术差距以及技术差距与进口规模的交乘项参数估计值都为正,说明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可能的原因在于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与本国中间品之间存在较大的技术差距,导致技术溢出效应不明显,对出口产品质量提升的作用不显著;而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与本国中间品之间的技术差距在合理范围内,技术溢出效应比较明显,能够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与前文基本保持一致,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

表5-2 进口来源地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InIM	0.022*** (5.74)			0.036*** (4.99)		
(InIM) ²	-0.019***			-0.020***		

	(5.64)			(5.72)	
$\ln GAP$		-0.106** (-2.35)			0.082** (2.96)
$(\ln GAP)^2$		-0.032*** (-4.53)			0.041*** (-4.15)
$\ln IM \times \ln GAP$			-0.007*** (-3.05)		0.005** (2.24)

(2) 按进口企业所有制性质分组。根据进口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将样本企业划分为国有企业、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三类，并分别进行检验，结果具体见表 5-3 所示。

从表 5-3 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中间品进口规模与技术差距的一次项系数都显著为正，而其二次项的系数都显著为负，结论与前文的研究结论基本相符。其中，外资企业中间品进口规模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程度最高，其次是私营企业，可能的原因在于外资企业自身产品的技术水平能力较高，学习、吸收、借鉴能力较强，能够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从而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其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也基本与前文保持一致，受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

表 5-3 企业所有制异质性分样本回归结果

变量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外资企业		
	$\ln IM$	0.017** (2.17)			0.035*** (5.74)			0.039*** (4.99)	
$(\ln IM)^2$	-0.027** (5.79)			-0.016** (5.67)			-0.041** (6.18)		
$\ln GAP$		0.155** (2.96)			0.124** (2.81)			0.106** (2.73)	
$(\ln GAP)^2$		-0.084** (-5.02)			-0.063** (-4.26)			-0.078** (-4.92)	
$\ln IM \times \ln GAP$			0.011*** (4.24)			0.014*** (4.17)			0.008*** (3.25)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 2010-2019 年相关数据探讨我国中间品进口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结果显示：中间品进口规模以及进口中间品与本国自产中间品的技术差距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都呈倒 U 型特征。分样本检验结果显示：来源于发达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负相关；来源于发展中国家的中间品，其技术差距与出口产品质量正相关。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1. 合理控制中间产品进口规模，优化进口结构。近年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扩大进口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中间品进口规模同出口产品质量呈现倒 U 型特征，因此，不能一味盲目的扩大中间品进口，并且对于中间品的进口应当有所侧重，要重点加大对重要设备、关键核心零部件、原材料

等中间产品的进口，同时，还要注重进口中间品的质量等级，不断优化中间品的进口结构。

2. 企业要加强自主创新，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企业一方面要加强自身中间品的生产，另一方面需要根据自身技术水平的实际情况，同时还要结合国内外企业之间中间品的技术匹配性来进口中间品。我国本土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在引进国外先进产品的同时，也要适当增加人力资本、技术研发、产品设计等方面的投入力度，充分发挥出进口中间品的技术外溢效应，从而不断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真正实现出口贸易由“价格竞争”向“质量竞争”转变。同时，政府也可以通过补贴、税收等方式为企业提供政策支持，帮助企业降低成本、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3. 加强同国外国家的贸易合作。我国应该根据当前外贸发展的实际情况，鼓励我国企业积极走出去，不断开拓国际市场。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的技术溢出效应，推动出口产品质量提升；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要加强技术领域的合作交流，促进先进技术的学习、借鉴和吸收，积极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谈判，推动贸易发展，促进贸易平衡，逐步实现我国出口产品质量的升级。

六、参考文献：

- [1] 张会清,唐海燕. 产品内国际分工与中国制造业技术升级[J]. 世界经济研究, 2011(6).
- [2] 王维薇,李荣林. 全球生产网络背景下中间产品进口对出口的促进作用——基于对中国电子行业的考察[J]. 南开经济研究, 2014(06).
- [3] 李淑云,慕绣如. 中间品进口与企业生产率——基于进口产品异质性的新检验[J]. 国际经贸探索, 2017, 33(11).
- [4] 刘俊华. 中间品进口结构对我国区域技术创新的影响——基于9个发达国家的实证分析[J]. 产业创新研究, 2020(1)
- [5] 韩纪琴,周靖. 扩大中间品进口规模对生态环境与产业链安全影响研究——基于制造业异质性中间品进口的污染减排效应分析[J]. 价格理论与实践, 2020(7).
- [6] Bas, M. and Strauss-Kahn, V. Input-Trade Liberalization, Export Prices and Quality Upgrading[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5, 95(2).
- [7] 李秀芳,施炳展. 中间品进口多元化与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J]. 国际贸易问题, 2016(3).
- [8] 吴艳芳,王明益. 我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基于中间品价格扭曲的视角[J]. 南开经济研究, 2018(01).
- [9] 宋跃刚,郑磊. 中间品进口、自主创新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升级[J]. 世界经济研究, 2020(11).

第六章 融资约束与研发投入——基于全球价值链出口活动的调节效应*

陈瑞 崔明懿²²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所在单位意见。

本文仅代表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文责自负。本文已被其他刊物录用，请勿公开发表或发布。

²² 陈瑞，男，汉族，经济学博士，美国普渡大学统计系访问学者，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货币经济、数量经济。崔明懿，男，汉族，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方向：风险管理。

第七章 疫后中文国际化发展的经验来源与新路径探析

张鹤曦²³

【摘要】全球要素流动加深了经济融通趋势，但也引发了文化冲突和价值摩擦，全球语言生态竞争愈发激烈，而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出现为其提供了新的手段和平台，进一步加重语言生态危机。语言与价值的拉锯并未随疫情退潮趋缓，反而呈现出新的极端化，成为全球竞争的一个侧影和真实写照，凸显出全球经济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将语言作为信息承载手段、文化沟通桥梁和价值传递工具，开始有目的地开展语言国际推广活动，借语言外部规划深化国际交往能力和话语权力。分析掌握过往各个国家、地区、组织如何利用语言国际化解解决现实世界中的语言及发展问题，并运用“ASPECT”模型结合疫情退潮后我国内外发展需求及环境现状进行对比分析，将切实有效地完善中文国际推广体系，提升语言实践的社会经济效益，最终外溢至全球经济互动发展大局，贡献中国的语言经验与文化智慧，为疫后世界经济生活秩序的良好转型提供正向牵引力。

【关键词】语言政策；语言战略；疫情退潮；语言生态；中文国际化

一、国外语言国际推广规划与政策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英汉“双语教学”进入国内大中小学，道路指示牌、店铺标牌、产品包装上与中文一同存在的拼音开始转变为英文翻译；在国外，孔子学院出海将中文和中华文化传播至世界各地。信息的数字化与国际化发展不仅对我国社会语言生活产生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也使得语言交融现象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出现。这一方面对各国国内官方语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另一方面，官方语言“全球化”让各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有了崭露头角的机会，两者共同作用，使得各国政府在调整国内语言政策的同时，也开始探索如何适当加快语言的国际推广进程。

从宏观角度看，世界主要国家通常都设立专门机构，负责本国的语言规划与对外语言推广，对本国语言战略予以高度关注和投入。美国国务院是对外英语教学的官方主管机构，美国驻各国的大使馆则负责具体运作流程。其最典型的对外推广政策是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行对外英语教学，托福考试、雅思考试、GRE 考试等成为外国留学生进入美国大学的外语通行证。由此，英语作为“世界语言”进入各国教育体系，影响各国语言、文化发展，形成“语言霸权”。“9·11”事件后，美国陆续出台《国家外语能力行动倡议》《国防语言转型路线图》《语言与区域知识发展计划》《国家安全语言计划》《国防部语言技能、区域知识和文化能力的战略规划（2011—2016）》等多项语言政策规划和举措²⁴，以加固英语语言及其所代表国家的国际地位。

1492 年，美洲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西班牙殖民者推广西班牙语的受众范围。18 世纪皇家西班牙语研究所成立，自此有了负责西班牙语标准化和使用的专门机构。西班牙语的推广主要通过三个途径：建立一个专门的语言推广组织；加强官方语言的教育体系建设，鼓励西班牙大学将西班牙语课

²³ 张鹤曦，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在读硕士，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语言经济、国际关系。（北京，100024）

²⁴ 王烈琴：《世界主要国家语言规划、语言政策的特点及其启示》，载《河北学刊》，2012 年第 4 期。

程作为外语开设；通过广播和电视等现代手段强化语言技能。

法国学院、法语和方言总局、词汇委员会和法国法语联盟是历届法国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用于规划和推广法语。法国学院专门从事法语拼写、词汇、语法和语法的标准化，技术词汇委员会负责语言环境规划，并负责规范各部委和社会行业的技术词汇，找出相关领域法语词汇的遗漏，并进行相关收集、纠正和推广，利用国际法语组织的资源传播官方词汇²⁵。1883年7月，一个促进法国和法国文化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法语联盟，于巴黎成立。它主要通过法语教学活动面向德国和国外法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学生推进法语和法国文化，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文化和语言多样性的论坛。在此之后，“法语国家国际组织”的出现也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为法国文化的影响力作出了超越国家实力的重大贡献。

日本政府建立了许多专门的日本资助机构，如1918年的“日中协会”、1931年的“日本六大文化协会”、1935年成立的“国际校友会”、1941年成立的“日本语言教育振兴协会”、1972年的“国际外汇基金”和1974年出现的“国际合作署”。日语的教习对象主要瞄准把日语作为第二语言学习的外国人，特别是学生和学者；以及生活在国外，特别是来自加拿大、美国夏威夷、加利福尼亚州，和拉丁美洲的日本移民。外语教学是日本最重要的外语推广形式。从1895年到1945年，日语的传播几乎扩展到整个亚洲地区。“二战”后，日本对外教育体系几乎瘫痪，在1954年重启、改良后，于20世纪70年代后重新进入兴盛期。日本政府成立了负责对外语言传播的基金会和国际合作协会，在对外文化研究、师资培训、教材编写、教学设置配置等方面的建设上投入大量人力和财力。至20世纪90年代，讲日语的人口已居世界第九位²⁶。

韩国外交和贸易部、文化和旅游部以及教育和人力资源部是韩国传播外国语言和文化的主要机构。韩国文化机构一般都带有图书馆、教室和带有投影设备的多功能会议室。当地人可以免费参加韩语课程、借用场地观看韩语电影和韩语书籍。

二、国际文化和语言推广平台运行模式对比

官方语言规划决定了一个国家语言国际推广的力度和深度，而具体的推广模式和平台则直接影响到语言推广效果和政策成败。歌德学院（德语）、法语联盟（法语）、日本文化交流中心—国际交流基金（日语）、英国文化协会（英语）是当前世界范围内极具代表性的国际文化和语言推广平台，分析这四大平台的运营模式、业务范围和收支情况，有助于了解相应语言的国际影响力，同时能够为探索中文的国际推广路径提供借鉴。首先，从几大平台的官网导引栏可看出其各自的项目服务方向，如歌德学院（见图7-1）除了德语教学与评测之外，最为突出的是其以电子图书馆、美术展、电影资源分享、独创杂志、媒体站为特色的艺术交流与信息服务。

²⁵ 戴曼纯等：《法国的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实践——由紧到松的政策变迁》，载《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1期。

²⁶ 苏金智：《日本的语言推广政策》，载《语文建设》，1993年第3期。



图 7-1 歌德学院（中国）官网界面首、尾导引栏截图

资料来源：歌德学院（中国）官网。

在其母网站 2019 年年度报告中，对旗下的国际艺术交流活动和信息提供平台也有较大篇幅的介绍（见图 7-2、图 7-3），通过与当前人们喜闻乐见的娱乐形式以及发达的数字技术相结合，2019 年歌德学院在世界范围内组织开办了 32000 场国际艺术活动，其线上图书馆访问量达到 1500000 人次，这些数字不仅仅承载了歌德学院当前的项目成就、资金流向，更是德国文化传播广度与深度的象征。在先进且合理的文化传播理念助推下，歌德学院从 1952 年成立至今已经在全球 98 个国家设立了 157 个分院、1100 个联络站，近年在俄罗斯、科特迪瓦、法国、埃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多哥以及中国迎来了歌德学院开设数量以及德语学习人数的剧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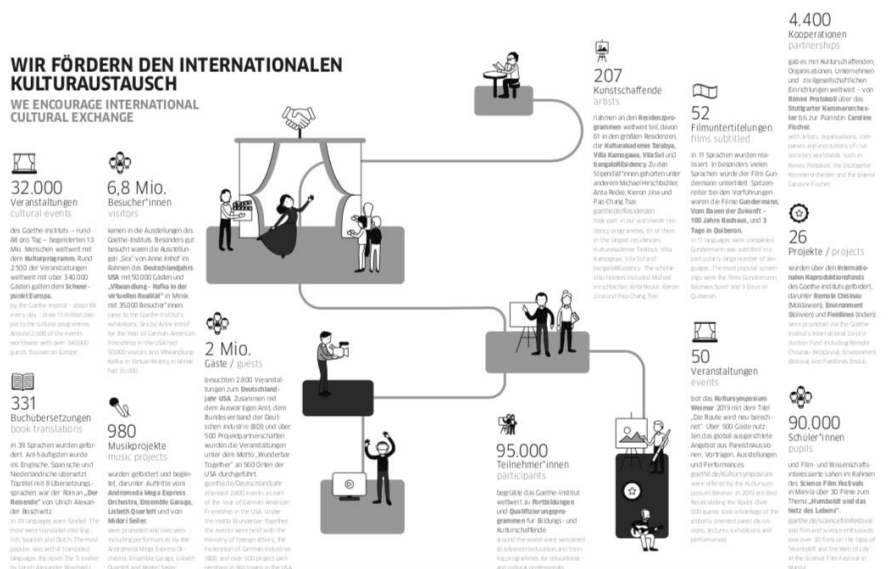


图 7-2 歌德学院 2019 年国际艺术交流项目相关数据公示

资料来源：歌德学院《2019 年度发展报告》。

WIR INFORMIEREN ÜBER DEUTSCHLAND
WE INFORM PEOPLE ABOUT GERMANY

1,5 Mio. Menschen / people
besuchen die Bibliothek der Goethe-Institute jährlich immer mehr Menschen die Anbieter. Besonders stark frequentiert waren die Bibliotheken in Bangkok, Toronto und Kolkata.

1,300 Multiplikator*innen, disseminators,
Fachleute und Journalist*innen nahmen an Informationsreisen für ausländische Gäste teil. Besonders viele Gäste kamen 2019 aus den USA, Großbritannien und der Türkei. Die Themen der 100 Besuche waren unter anderem digitale Transformation, Bildung und Ausbildung, Postales, alternative, Start-ups und Nachhaltigkeit.

250.000 Ausleihen media borrowed
wurden über das Online-Bibliothekssystem „Jubilee“ entliehen. Das ist durchschnittlich 200 Entlehnungen pro Tag. Besonders stark genutzt wurde die Reihe in Frankreich, China und Spanien.

10.500 Beiträge / articles
erschienen in deutschsprachigen Medien zu kulturellen, sozialen und politischen Fragen und Projekten des Goethe-Instituts. Besonders von Interesse waren die Meldungen zum Deutschlandjahr USA, dem Kulturprogramm „Wahrheit und Gerechtigkeit“ und der „Deutschland-Tage“ in New York.

712.000 Medien / media
sind in den Bibliotheken der Auslandsstellen zur Verfügung. Täglich werden im Durchschnitt rund 2.300 dieser Medien CD und DVD ausgeliehen.

4,7 Mio. Fans und Followers
haben das Goethe-Institut auf Facebook und Twitter verfolgt. Die regionalen Facebook-Seiten in Argentinien, Brasilien, Deutschland und Mexiko verzeichnen besonders viele Fans.

20 Mio. Interaktionen / interactions
haben auf den Social Media Kanälen zum „Deutschlandjahr USA“ im Jahr 2019 stattgefunden. „Tag der Deutschen“ und „Tag der USA“ waren die meistinteraktiven Beiträge auf der Homepage.

41,5 Mio. Besuche / visits
auf der Website des Goethe-Instituts pro Tag. Aufgeführt sind die Besuche der Website des Goethe-Instituts in den USA, Brasilien und China.

280.000 Follower / followers
haben das Goethe-Institut auf Instagram gefolgt. Das Goethe-Institut hat auf Instagram 192.000 Follower.

16.000 Teilnehmer*innen participants
haben sich an Workshops, Webinars und anderen Aktivitäten des Goethe-Instituts angeschlossen.

图 7-3 歌德学院 2019 年线上图书馆及媒体平台相关数据公示

资料来源：歌德学院《2019 年度发展报告》。

其他各平台在推广方式上也有较为类似的地方。英国文化协会在和中國、俄罗斯等国家联合开办艺术活动的同时，考虑到了部分人群因为物质条件或个人习惯仍旧使用电台，英国文化协会创立了自己的电台节目，以包含更广的受众。此外，通过涉足社会领域（见表 7-1），塑造勇于承担责任、心系人类福祉的形象，成功争取到了一定的社会声望。据其最新公示的数据，2020 年其通过文化保护基金向 42 个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放了 970 万英镑的赠款。法语联盟的文化活动涉及音乐会、歌舞表演、舞台剧、美食工坊、法语角等多个方面，同时，法语联盟的共有 484 家多媒体图书馆，每年收藏近 1400 000 部作品。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则更是在日本文化传播上投入了极大资源。在其对外门户日本文化交流中心网站上，将下属项目划分成了三大类：“文化艺术交流”“海外における日本語教育”和“日本研究・知の交流”，其中第一个板块下的主要活动是在世界各国举办画展、公演、动漫节和文艺座谈会，第三个板块主要是同各国大学、企业建立联系与合作，包括培养研究人员和在各机构内设立文化研究所。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年报（2019）》，在其 2019 年的支出构成中，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 35%是围绕日本文艺、习俗、历史等内容的推广与研究展开。

表 7-1 英国文化协会在艺术、教育及社会领域工作一览

领域	具体工作项目
艺术	2021 年中英文化连线基金
	Five Films For Freedom 2021
	电台节目《英伦音乐前沿》
	天地留声·中英音乐人创作计划
教育	对接高等教育，提供近 400 款免费英国大学线上课程
	英语教学、测评

社会	The Climate Connection 项目
	中欧法律援助合作项目
	制定《中英社会企业及社会投资名录》

资料来源：英国文化协会（中国）官网。

在语言推广方面，几大平台的通用路径是“培训+考核”双推进。一方面在全球范围内通过设立平台下属分机构、与政府和企业合作办学等方式进行日语教学培训和人才培养；另一方面，通过制定模式化测试标准、开发数字化测试平台等方式为学习者提供学习和考级一条龙服务，部分平台还通过与高校对接进而为学习者提供升学、留学等借助所学语言开展进一步学习的机会。在具体的服务种类上，歌德学院除广泛寻求考试合作伙伴，设立教材中心、德语阅览室、文化协会和语言学习中心，还为有需要的学院提供住宿服务，营造“基地式”沉浸化体验。全世界有 1550 万人学习德语，其中 940 万人在欧洲。278000 人受到歌德学院的欢迎。在课程设置上，法语联盟按照对象学员的年纪将课程分成两大类：成人(15 岁及以上)及青少年(3—14 岁)。其中 3—14 岁的孩子又细分为启蒙班(3—5 岁)、儿童班(6—7 岁和 8—9 岁)、青少年班(10—14 岁)，每个班都有适应该年龄段的教材。15—18 岁的青少年可以选择直接上常规的成人班，也可以用专属教材上私教课。具体课时的划分是严格按照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CECR)来进行，以不同需求再划分出不同强度的课程，具体见表 7-2，每种课程不同时间段的班都有最低开班人数。

表 7-2 法语联盟部分现设课程、学时及最低开班人数一览

课程名称	学时（小时/周）	最低开班人数（人）
全日制班	25	6
晚班	7.5	6
周末班	10	6
晚班+周末班	7.5	6
周末单日班	5	6
中级法语精修小班	—	3
口语专攻班	4	4
英法双修班	4	4
DELF/DALF 考前冲刺班	—	4
青少年法语课程	1.5（3—9 岁）	3
	3（10—14 岁）	
一对一私教课	—	1
一对二亲子课	—	2

资料来源：法语联盟（南京）官网。

在资金来源和经济贡献程度上，英国文化协会因英语学习者体量相对较大，因此其教育板块带来的经济效益最为突出，而歌德学院因其开设的多样化艺术活动种类因此有较为丰富的收益来源，法语联盟则因上述提到的详尽的教学课程设置，调动到了不同人群的参与积极性，因而在具体的课

程培训收益比例上较有优势,相比之下,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则广泛在下属各平台投放资金招募通道,吸收集体或个人捐助,营收总额在几大平台中遥遥领先²⁷,在其年度报表中也有相当大的篇幅罗列该阶段所收集到的款项及其来源。除此之外,各平台均享受一定程度的政府资助和政策优惠。下将部分可获数据整理如表 7-3 所示,以期对相关平台的服务力量和社会经济贡献度形成可视化比较。

表 7-3 2019—2020 年度各平台文化及语言推广成绩对比

平台名称	学习人数(万人) ²⁸	测试内容及人数(万次)	总营收(已统一换算为人民币计量)(元)
歌德学院	27.8	B2-Goethe-Zertifikat 格式/70	6,899
英国文化协会	9600 ²⁹	EnglishCore/400	11,413,837,200
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14.2 ³⁰	1. 日语能力测试(JLPT) /135 2. 国际交流基金日语基础 テスト(JFT-Basic)/0.80	18,407,439

资料来源:歌德学院、英国文化协会、日本国际交流基金 2019—2020 年报。

由此我们可结合各大语言国家推广平台的成就得出初步判断:一方面,要学习日本文化中心,广开资金门路,吸纳政府、企业等组织与个人的力量,同时要争取政策支持,并与各级政府单位联动合作,夯实语言文化出海硬基础;另一方面,从英国文化协会和歌德学院的服务重心可知,要根据国家形象和文化印象拓展文化推广路径。以文化出海带动语言推广,以语言学习助力文化普及,勇挑社会责任大旗,全方位提升语言文化国际认同;而在具体教学方面,则可参考法语联盟多样化、人性化的课程设置,以及各平台“入门+测试+升学”的一体化流程及“基地式”一条龙配套服务,拓宽受众人群,提升用户体验。对此,以下将结合我国语言文化推广现状作进一步分析。

三、疫后时代要素全球化下的中文国际化

当前,我国“一带一路”建设正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并通过孔子学院等国际中文教育活动推动语言文化的畅连,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一带一路”语言国际化战略目标尚未明确,中文国际化政策尚待清晰,急需从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战略高度制定“一带一路”语言战略规划和行动方案。首先,我们需要明确当前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状况和面临的问题,其次,要利用前文研究成果,借鉴他国语言国际推广的内容、模式和运

²⁷ 因各平台统计方式与内容并不相同,因此实际情况或有出入,此处均选取年度报表中“总营收”栏数据进行对比,尽享减少其差异性。

²⁸ 此栏中数据所对应项目在体量和内容上均不一致,已分别标注,仅提供参考。

²⁹ 该数据为英国文化协会数字学习频道年度使用人数。

³⁰ 该数据为“JF 日语学习学校”用户注册人数。

行机制为疫后中文国际化探寻新出路。以下将按这个逻辑分两大部分来阐述。

1.中文国际推广现状-运用“ASPECT”模型分析国际中文教育发展

在这里我们以国际中文教育为对象建立了一个“ASPECT”分析模型（见图7-4），即从目的、对象、模式、情感、内容、技术为考量内容，全面分析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现状，进而可以直观地展现出当前的发展问题及潜在风险，并且能有效地为未来发展路径提供指引。这一模型不仅可用于国际中文教育发展，还可适用于分析国内外其他文化和经贸等领域的交往活动。以下将利用该模型对国际中文教育进行六个层面的具体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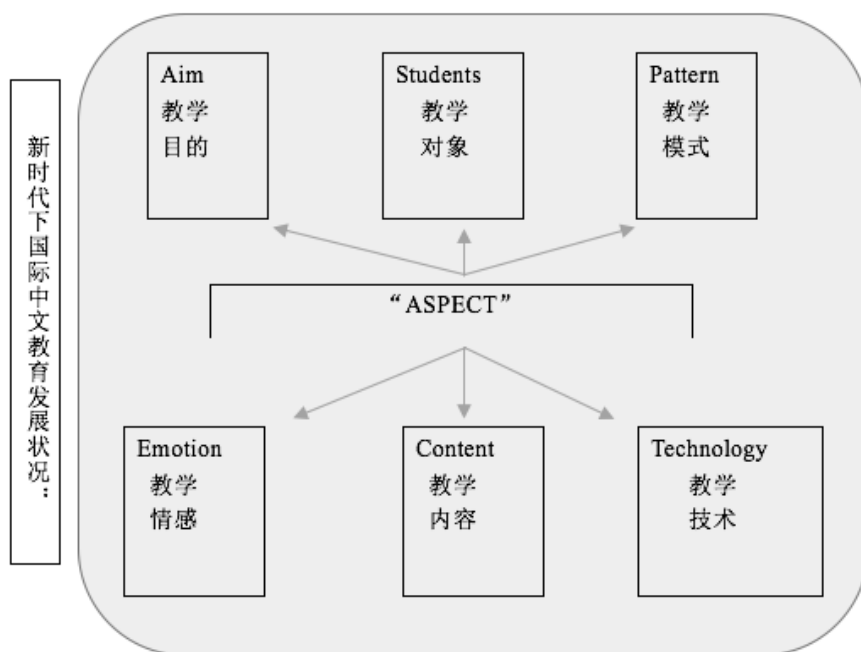


图 7-4 新时代下国际中文教育的发展状况“ASPECT”分析模型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在教学目的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为国际中文教育带来新的职业发展目标。“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汉语国际化人才需求呈现出覆盖生活各个领域的趋势，在国际化人才培养中，汉语教学已成为对外教育的首要 and 基础环节，而中国国际化人才的培养也成为中国国际化教育的一个重要角色。近年来，报纸经常刊登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国际化人才需求的报道。相关需求领域已从“一带一路”初期基础设施建设、融资、贸易等学科发展到目前的全覆盖，包括高端科技、农业、医药、地理、生物科学、精神科学、历史文化、艺术和体育具有多种特征，“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³¹。在这些急需的国际人才培养课程中，汉语教学已成为首要和最基础的语言培训，“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语言人才培养也成为中国国际教育的重要角色。“基于国际化中国人才的一带一路建设是当前中国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相对薄弱和单一，迫切需要对培养模式进行转型和创新发展³²。

³¹ 李宇明：《“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载《中国科技词语》，2015年第6期。

³² 邢欣等：《“一带一路”倡议下的汉语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型与发展》，载《世界汉语教学》，2020年第1期。

在教学对象方面，国内留学生和学历生数量大增，同时国际汉语学习者呈现出低龄化和成人化倾向。一是国内汉语国际人才培养的变化呈现出留学生人数增多和学历生增多。二是参与学习的年龄层次也有所变化，既有低龄化倾向又有成人化趋势。李宇明专门探讨过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问题³³，他指出，中国留学生最近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名人学习汉语所产生的示范效应会影响一群人；而一些国家，如法国、英国、美国、泰国、韩国和俄罗斯，接受或吸收外来留学生使得相关学校和专业快速扩张³⁴，小学和中学（即低龄化教学）也出现了对中文学习的需求。在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吸引低龄学生的兴趣，也就是说，青年教师必须唤醒青年学生的兴趣，了解他们的精神需求，保持他们对中文持续的兴趣，深化他们的语文学习动力。成人中文学习趋势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国家提供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中国化职场口语培训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在成人汉语学习的这一部分，更多地需要关注汉语常识和简单的后汉语术语的普及。

在教学模式上，传统的线下教学模式仍是主流。当前，虽然远程教学、网络教学、慕课(Moocs)等超时空的教学方式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固定空间的课堂教学也融入了线上教学的一些内容和元素(如课件、文件链接等)，但在许多情况下，教材的内容被转化为信息并在课堂上展示。因此，传统的课堂教学总体上仍然是绝对的主流和主要技术，黑板和粉笔仍然是许多班级中最重要的教材，大部分教学内容不超过教材的纸质内容，课程设置仍以课堂教学环境为基础，教材编写基本上没有包括网络层面的教学内容和学习任务，教学理论和理论的研究继续侧重于传统课堂教学，教师发展研究及其研究仍然主要基于传统课堂教学技能，而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主要还是基于教学环境，值得注意的是，绝大多数教师和学生已经习惯了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甚至有这种感觉，经过多年的课程设计和系统及课程的实施，人们普遍缺乏通过网络建立课程和课程的意识，课堂教学的质量和效率没有得到最大化，语言教学几乎局限于课堂，借助网络将课堂和课外学习联系起来并结合起来并没有成为普遍的教学原则。

在教学情感上，国际中文教育正在努力争取国际认同。现有的国际汉语教材在呈现中国社会文化的话语框架和话语特征方面存在很多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在呈现中国经济成就时，话语维度相对统一，它只是用发展速度来描述，没有讨论其他经济发展的话题，比如转型和优化。我们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崛起”的经济图景，但是教材中却到处如联想收购 IBM、TCL 收购施耐德、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石油公司等“收购世界”的中国企业形象；我们希望树立“合作共赢”的中国理念，但是“进军海外市场”“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等字眼频繁出现³⁵。再以国际汉语教材中中国经济形象设计的一个例子，我们注意到，语篇的选择主要是“中国”“政府”而从如外国留学生、外国游客、在华外商、华侨华人等不同身份的角度看中国的经济形象，将有助于缩短与读者的距离，促进对中国经济形象的接受和认可。目前，中国经济形象的叙事主题主要集中在某些群体，相比之下，普通人的声音非

³³ 李宇明：《海外汉语学习者低龄化的思考》，载《世界汉语教学》，2018年第3期。

³⁴ 郭熙：《论祖语与祖语传承》，载《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3期。

³⁵ 彭增安等：《国际汉语教材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现代出版社，2020年版，第582—593页。

常微弱³⁶。

从教学内容来看，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突发事件充盈了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内容。一方面，疫情使传统的语文教学研究难以开展，如基于传统课堂的教学与习得研究、基于眼动仪或脑电等设备的语文认知研究；此外，由于疫情，外国学生无法返回线下课堂，导致相关研究数据的收集受到重大限制，另一方面，疾病状况提供了新的研究课题，并开辟了在线教学和紧急语言服务等研究思路。如何根据在线学习的特点和经验，介绍一些在线学习的理念和实践，以及如何拓展和延伸在线学习的空间和内容。换句话说，后流行病学发展应利用网络教育的可能性，对国际汉语教学和研究进行长期、全面的规划和设计，积极推进语文教学和网络研究的全面转型和现代化，推动仍以线下教育为重点的国际语文教学，走向未来的现代学科发展和建设，这应该是这个公共安全事件给我们的最大启示，也是提高学科建设水平的大好时机。

着眼于教学技术，人工智能、5G、云存储、区块链等技术的更迭升级为国际中文教育提供了新手段。互联网技术的进步和飞速发展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也引领了新时代语言教育理念的更新。魏晖提到，新时代是世界进入智能化的时代，智能时代的语言教育将发生深刻变化³⁷。新时期的语言教育理念包括提高语言能力、认知发展和终身学习的优质语言教育，这必须要有语言技术的加持，因此要加强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应用。此外，新时代对语文教育理念的新要求也体现在对中国国际教育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上，人工智能从根本上改变了固有的互动模式。传统的师生二元互动被教师、人工智能技术和学生的三方性质所取代。在这种新的模式中，参与者的身份、地位和功能被重建，形成了一种双向互动，建立了多方位、网络化的互动关系，其中教师的一些职能转移，互动焦点的认同弱化；人工智能技术已成为教师的延伸，教师可以独立或支持教师与学生互动，创造“人机学习”的场景；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不断巩固，学生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选择权，反馈渠道更加多样化和畅通³⁸。

2. 中文国际推广经济化发展新视角

除解决当前中文国际化面临的发展问题，改善发展状况之外，我们要发扬海外汉语传播实验高地的优良模式，还要结合其他国家通用语言国际传播经验，为中文的国际传播与发展开辟新视角，在此提出三条路径。

(1) 守正出新，线上线下结合发展

随着形势的发展，中文的线上教学正在从之前的“线下辅助”和当前的“应急替代”逐步呈现出某些独立品质，成为与线下教学并行的样态。从当前发展趋势上看，线下教学虽不会被完全取缔，但不可否认的是未来线上教学比重将逐渐加大，因此怎样在两者并行的基础上，利用线下教学的经验解决线上教学的缺陷，是值得探索的部分。在线课程面对的是一个非生命体的镜头，缺少诸如肢体

³⁶ 彭增安等：《传播学视阈下的国际中文教育主体研究》，载《河南社会科学》，2021年第2期。

³⁷ 魏晖：《新时代的语言教育管理》，载《语言文字应用》2019年第1期。

³⁸ 巴丹等：《“汉语国际教育线上教学模式与方法”大家谈》，载《语言教学与研究》，2021年第2期。

和表情等“温度”的表达。此外，网络信号和学生互动效果将直接影响教师的教学体验，因此，有必要在教学设计中把互动作为最重要的因素，以便尽可能地在课堂上注入“新鲜血液”，提升课堂活力。首先，需要施教者充分挖掘线上资源，更新互动理念，利用现实生活中可理解的语境，引导学生完成信息解码和反馈。其次，要根据各阶段的教学目的，丰富互动层次，如以单节课程为单位，开展课前自学效果检测、课堂情景演练以及课后巩固答疑，或以学期为单位划分不同阶段开展多层次互动。还可借助新线上平台，熟悉运用各种线上教学软件，根据不同需求交替使用，并借助点赞、举手、弹幕、互评、抢红包等功能调整互动任务，同时借助人脸、语音识别等人工智能技术作为辅助。

(2) 多元互补，跨层级整合主体资源

要突破现有以教师为传播主体的单一模式，统筹发动志愿者、助教、地方组织和民间机构、当地政府、学校，整合不同主体资源，建立本地化教育体系。例如，吸引来自中医、武术、艺术、科技专业的志愿者，提高他们的汉语教学和文化交流技能，教授他们大众外交和公共外交的基本知识和方法，使他们能够具备开放的心态、专业素质和强效技能，顺畅地与当地人交流，为国际汉语交流发挥更大的作用。除此之外，还可以邀请学习过汉语国际教育的大学生担任助教，解决学生预习、课堂和家庭作业中的问题，做好学生个人的学习记录，全面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帮助教师减轻工作量。同时，从宏观角度看，我们不仅需要个人的参与，一方面还应该与当地中小学建立汉语合作项目，支持更多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提供汉语教师、教材和其他必要的教材以及汉语教育课程，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和非国家力量也应参与国际汉语教育的具体项目。由民办教育机构和企业经营，有效动员社会各界力量，逐步实施中国主要教育体系的营销，同时鼓励符合要求的民办教育机构，开展与汉语教育相关的活动，为他们提供智力支持和建议，搭建多元化的国际汉语教育平台，巩固中国参与的基础。

(3) 目标导向，精细培养专业人才

从目前的发展目标来看，国际汉语教育今后应做好专业化、精细化的人才培养，以实现准确的工作满意度；同时，要有效拓展国际汉语教育的内涵和质量，提高中国语言文化的国际知名度。海外华文教育是深化国际华文教育和华文教育国际传播的重要途径。海外华人和相关组织是直接驱动力，推动中国人融入当地民族教育体系，争取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国际认可。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帮助中国教育方面的出海企业，建设示范学校，助力他们打造中国教育品牌，今儿发挥示范和辅导作用，与中国本土学校开展“中国寻根之旅”等文化交流活动，让中国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中国语言文化的魅力，缩短中国学生与家乡的距离，提高他们对传承中国语言文化的渴望和认同。同时支持“汉语+”项目，依托职业学校为技术人才提供汉语培训，努力培养“汉语+”职业培训的准人才“文化。协助高校开展中文专业学术教育，整合优势资源，加快和帮助建设中文本科专业，培养高端汉语人才。针对国家、公司和专业开展有针对性、有针对性的精准教学。确保口语生活、技术操作词汇和句型的准确性，实现语言和安全，共同开辟国际汉语教育机构培养的新高地。